在動亂中堅持民主的胡適

張 忠 棟

胡適一生做了許多播種的工作，除了在教育、學術、文學、語言等方面的努力之外，在政治上也是終身呼喚民主。本文把他努力民主的一部份，時間上從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到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撤守爲止，試作較爲完整、較有系統的討論。

那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基本上是一段動亂的歲月。先是德、意、日三國法西斯勢力的崛起，造成國際上不斷的糾紛衝突，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又有共產極權勢力的擴張，造成戰後國際的緊張對立。中國在這一段長期的動亂之中，眞正是首當其衝，深受其害，抗戰的犧牲，大陸的赤化，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慘痛經驗。

胡適在那段歷史中，是親身參與其事的歷史人物。從九一八到七七盧溝橋事變，他是北大文學院長，同時和一些學術界的朋友辦獨立評論，對政治外交各方面的問題，不斷的提出批評和建議。抗戰全面爆發之後，他奉命到美國去辦外交，做了一年特使，四年駐美大使，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大使卸任之後留在美國，繼續私人的研究工作。勝利以後，他應聘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除了主持校務，也到南京參加了國民大會。民國三十七年底，北平情勢危急，政府派專機去把他接出來。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他再度奉命做外交的挽救工作，從上海坐船去美國。

了解了動亂的背景和胡適個人的簡單經歷，再看那一段時期他在民主方面的言論和主張，大約可以分爲三個方面，一是他和朋友在獨立評論辯論民主和獨裁，一是他在中日衝突中看民主憲政和獨裁極權的分野，最後是他在共產極權擴張中堅持民主。在下文的討論中，第一、二、三、四節就是分析第一方面的辯論，第五、六兩節探討第二方面的問題，第七、八兩節便是表現他在第三方面的堅決。

一、

九一八以後，胡適和北平的一班朋友常常聚會，討論國家和世界的形勢。有人發起要辦一份刋物，他和丁文江因爲有過辦努力周報的經驗，知道辦刋物的困難，加以北平公安局剛剛查扣了新月第二卷第八期，把新月書店的兩個店員也捉了去，因此大家原來都不十分熱心。但是到了民國二十年年底，胡適和丁文江還是心動了。於是丁文江提議，仿照努力周報的辦法，請願意辦刋物的人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先積了幾個月的捐款，然後於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創辦獨立評論，由胡適、丁文江、蔣廷黻和傅斯年先後負責編輯工作①。

胡適原來主張結束訓政，實行憲政，曾因在新月發表「人權與約法」以及「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兩篇文章，而激怒國民黨當局，結果不得不辭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回到北平②。爲因應九一八事變與一二八淞滬戰爭，政府於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召開國難會議，會議前後許多人重新討論結束訓政實行憲政③，有人對於憲政還是不斷發出悲觀懷疑的論調。梅思平從民國初年國會經驗看，認爲「在初行民治的國家，議會的權力越大，它的腐化也越容易」，「質問、查辦、彈劾諸權，都變成敲竹槓的利器，官吏任命的同意權，簡直是納賄的好機會」。何浩若認爲「民主政治便是資產階級的政治，便是保護有產階級而壓迫貧苦民眾的政治。………建國首要在民生，舍民生而談民主，便是舍本逐末」。季廉在國聞週報撰文，以爲憲政的實行要具備三個先決條件，一須教育進步，二須交通發達，三須政風良好，但是中國沒有這些條件，所以民初行憲造成種種賄選醜聞，在「內訌愈烈，災禍愈多，經濟破產，民不堪命」的時候再談行憲，一定要演成比民初更醜的滑稽劇。他

①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臺北中央研究院，民國五十四年），頁八二～八五。從新近出版的胡適書信選看，俞平伯曾於九一八以後寫信給胡適，言及清華學生停課，實行軍營生活，「長此以往，恐一般民衆及學生運動逐漸入歧途，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危機四伏，未堪設想」，因建議辦一周刋，以求在治標方面「息心靜氣，忍辱負重，以抵禦目前迫切之外侮」，在治本方面「提倡富強，開發民智」。此信寫於九月三十日，或爲最早建議辦刋物者，也頗能道出當時北平一般穩健派教授的心情。獨立評論決定出版，由胡適於民國二十一年三月致函北平公安局長鮑玉麟申請登記。以上俱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以下簡稱書信選，並加册次頁碼），中册，頁八三～八四，一〇七～一〇八。

② 張忠棟，「胡適從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刋，第十四期（南港中央研究院，民國七十四年），頁二九一～三二五。

③ 四月二十四日，胡漢民在廣東發表關於憲政的談話說：「我人不但不反對憲政，且必竭全力以實行憲政，惟我人不重在施行之遲早，而重在其眞僞，……」。同日孫科在上海發表抗日救國綱領，提出憲政的具體步驟，如起草憲法，允許人民自由組織政治團體，以及召開國民大會等。這些都是國民黨要員主張行憲的實例。見大公報（上海），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斷言憲政論的根本立場就不健全，因爲：第一，從理論上言，議會政治是資本主義的產物，現在世界經濟恐慌普遍發生，資本主義踏上沒落的階段，議會政治更是破綻畢露；第二，從事實上言，英美民主政治並不是民主政治的典型，眞正民主政治要包括經濟上的平等，近年英美失業日增及社會不安，證明英美政治的欠缺；第三，從中國需要上言，憲政政治不能解決目前困難如「土皇帝」和共產黨；第四，爲立國久遠計，中國不應將資本主義的唾餘，奉爲金科玉律，而應採用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中山遺教所謂民生主義卽是社會主義，所謂迎頭趕上去，意卽在此④。針對這些消極否定民主憲政的說法，胡適在獨立評論的創刊號上就寫了「憲政問題」。

胡適強調憲政和議會政治都只是政治制度的一種方式，不是資產階級所專有，也不是專爲資本主義而設。在歷史的過程上，議會政治曾是中產階級向獨裁君主作戰的武器，也曾屢次有工黨代表因議會政治而掌握政權，近百年所有保障農工和制裁資產階級的種種「社會立法」，也都從議會裏產生出來。談到社會主義的說法，胡適指出議會政治和憲政不是反對「民生」的東西，也並非和所謂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不能相容，問題在於「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是否只有無產階級專政一種方式。他進一步質問說，如果「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只有無產階級專政一種方式，則不相信中國可行憲政的人，是否就以爲中國已經具備無產階級專政的種種條件？關於憲政是否能救中國的問題，胡適答覆說他不相信「憲政能救中國」，但他深信憲政是引導中國政治上軌道的一個較好方法，政治必須依據法律，政府對於人民應負責任，這是憲政的兩個基本原則。最後談到土皇帝，胡適相信土皇帝難制裁，但是黨不能制裁土皇帝，政府不能制裁土皇帝，就該試試人民代表的制裁能力。然後他指出倪嗣冲、馬聯甲盤踞安徽的時代，一個很腐敗的省議會能够反抗鹽斤加價，能够使安徽人民不增加一個錢的負擔，證明人民代表和議會政治確有制裁土皇帝的作用⑤。

大約半年以後，胡適有一篇文章呼應汪精衛的演講「用何方法達到統一的目的」，其中更是認定議會政治是推翻各省割據局面，達成全國統一的有效方法。他說：「現在統一的最大障礙是在各地割據的局面之上絕沒有一個代表全國和全省人

④ 梅思平與何浩若的意見轉引自胡適，「憲政問題」，獨立評論，第一號（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頁五～七；季廉，「憲政能救中國？」，國聞週報，第九卷第十八期（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九日），頁一～六。

⑤ 胡適，「憲政問題」。

民的機關，所以割據分裂的趨勢無法挽回。挽救的方法只有在各割據防區之上建立全省民意機關，在各省割據區域之上建立全國民意機關。只有國會和省議會一類的民意機關可以超越一切割據的區域，造成一個統一國家的最高統治權的基礎。也只有這一類的民意機關可以領導民眾在法律的軌道內逐漸造成制裁割據軍閥的勢力」。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適也贊成汪精衞「以均權來求共治」的主張。他認爲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要想用武力求統一，求全國一色的統一，實在非常困難，比較好的辦法還是用均權的辦法求聯省式（或聯邦式）的統一。所謂均權，是把中央與地方的權限明白規定，或中央列舉權限，其餘權限都歸各省依各省的情形自訂，或明訂地方權限，而其餘權限歸中央。依中國的情形，胡適認爲似乎應該採用中央列舉權限而以餘權歸地方的方式⑥。

在獨立評論創刊的最初半年之中，胡適不但提出憲政和議會政治的主張，他並且強調民間組織的結合和社會新重心的建立。胡適和丁文江兩位好朋友都反對武力革命，主張用和平的手段，作長期的奮鬭，來改革中國的政治。但是丁文江一方面寄望知識份子努力，要知識份子組織小團體研擬方案並且督促政府，另一方面他更期望國民黨的努力。丁文江說他不是國民黨員，不能贊成國民黨搞一黨專政。但是他承認國家處於危急的時候，沒有人可以替代國民黨執政，要使政治的和平改革成爲可能，便要靠國民政府「絕對的尊重人民的言論思想自由」、「停止用國庫支出供給國民黨省縣市各黨部的費用」以及「明白規定政權轉移的程序」。九一八事變一週年，丁文江有「抗日剿匪和中央的政局」一文，談到內憂外患，也是希望國民黨先建立負責任的政府，先成爲一個團結的政黨。他說，許多人和國民黨的政見並不相同，不過在國難期中，大家都希望要有政府，不肯「以全局之安危，殉彼此之意氣」，國民黨若要得到大家的合作，來謀根本的建設，本身內部也不應該「以全局之安危，殉彼此之意氣」而應化零爲整，變成功一個有紀律、有能力的政黨⑦。比較起來，胡適對國民黨的發展頗爲惋惜，而寄望於民間社會組織發展新的力量。

按照胡適的想法，如果讓若干學術團體、商人團體和技術職業團體結合在一

---

⑥ 胡適，「統一的路」，獨立評論，第二十八號（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頁二～六。

⑦ 丁文江，「中國政治的出路」與「抗日剿匪和中央的政局」，獨立評論，第十一號（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頁二～六，以及第十九號（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頁八～十。寫第二篇文章的時候，正值汪精衞辭行政院長，新行政院長遲遲不能產生，所以丁文江很感慨的說：「目前一個行政院長辭職了一個多月，竟沒有第二個行政院長能够產生。原任的人不肯回任，代理的人不肯負責，當國家大難臨頭的時候，握政權的黨人，把政府弄得若有若無，非國民黨的國民，縱然有願意和國民黨合作的，也覺得愛莫能助」。

起，其中有知識高明眼光遠大的分子，只要有能負責任的領袖人物出來號召，「在一種積極的、建設的、有益於國家民族的目標之下，應該可以產生一個有力量的政治大結合」。這樣的一個團體，如果沒有更適合的名稱，可以稱它做「建國大同盟」，它的任務是監督、指導並且援助政府。談到建立新的社會重心，他先以失望的口氣說：「民十五六年之間，全國多數人心的傾向中國國民黨，眞是六七十年來所沒有的新氣象。不幸這個新重心因爲缺乏活的領袖，缺乏遠大的政治眼光與計畫，能唱高調而不能做實事，能破壞而不能建設，能箝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這四五年來，又漸漸失去做社會重心的資格了」。然後他提出新的社會重心所應具備的條件：第一，必不是任何一個人，而是一個大的結合；第二，必不是一個階級，是擁有各種社會階段同情的團體；第三，必須能吸收容納國中的優秀人才；第四，必須有一個能號召全國多數人民的感情與意志的大目標，它的目標必須是全國的福利；第五，必須有事功上的成績使人民信任；第六，必須有制度化的組織使他可以有持續性。最後他說：「我們環顧國內，還不曾發現這樣的一個團結。凡是自命爲一個階級謀特殊利益的，固然不够作社會的新重心，凡是把一黨的私利放在國家的福利之上的，也不够資格。至於那些擁護私人作老板的利害結合，更不消說了」⑧。

就在這個時候，楊公達在時代公論上連寫三篇文章，居然主張國民黨走法西斯的道路。他說，國民黨有一派應以統一黨權爲己任，採用史達林對付托洛斯基，墨索里尼對付尼梯的辦法，不惜放逐異己的派別，舉一網而打盡之，藉此達成國民黨的統一。他說，國難時期的政府應該取消五院制，採取元首制，而作爲元首的「要絕對負責，不特要負興國的責任，還須要負亡國的責任，………不特要下流芳百世的決心，還須要立遺臭萬年的遺囑」。他不相信九一八以來的中國政治有「精誠團結」的可能，主張「與其多方面的組織政府，不如一方面的組織政府」⑨。胡適希望民間社會力量的結合新生，希望發展憲政和議會政治，楊公達所要求的，竟是國民黨內某一派的獨斷獨行，這中間的差距實在太大了。

胡適正想作文討論楊公達的主張，就收到陶希聖寫的「一個時代錯誤的意見」，他看了之後，立即在獨立評論上予以發表，並且表示他自己的文字可以暫時不做

⑧ 胡適，「中國政治出路的討論」與「慘痛的回憶與反省」，獨立評論，第十七號（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十一日），頁二～六，以及第十八號（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頁八～一三。

⑨ 引見陶希聖，「一個時代錯誤的意見」與該文之後胡適的「附言」，獨立評論，第二十號（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二日），頁二～三。

了。陶希聖駁斥楊公達的錯誤意見說：「目前社會上的論爭，正集中到國民政權的取得和運用的問題。這問題的提出，是由於國民黨過去幾年黨政和訓政方法不能集中民力以救危亡。現在的問題不是在國民黨各派團結或互相殘殺，而是在國民黨各派卽令團結仍不够救中國於危亡。楊先生把問題移到國民黨黨內紛爭，並且把眼光縮小到一派上去，完全是不能了解國民的現狀，不能了解國民的要求」。他堅信開放政權於全體國民，集中全國國民力量才是救國的道路，蔑視國民的力量，專談國民黨一派兩派主政的問題，便是把國民拋開在政權之外，把中國時局的危機和出路拋開，專門搞鈎心鬬角的政治鬬爭。胡適刋出陶希聖這篇文章，寫了一段附記，顯示陶文的由來與意義，然後他引用上海一位老先生的來信說：「近來政治不上軌道，當然政府之過，亦因社會寬縱過甚（除共產派外），不免陷長君逢君之病。平心言之，當局非絕對不可爲善」。他希望自命負言論之責的人，都應該接受這位老先生的忠厚勸告⑩。

簡單分析獨立評論最初半年的內容，可以發現胡適主張憲政和議會政治，反對任何一黨一派或一個階級的獨裁專政。更値得注意的是他和好朋友丁文江的看法已有不同。丁文江爲了國難特別寄望於國民黨的團結，胡適對國民黨頗感失望，認爲民間社會應該結合發展成爲一股監督制衡政府的力量。

二、

胡適和朋友們辦獨立評論，雖然都是因爲眼見國難當頭，想發表一些負責的言論，但是他們彼此的意見很不一致，常常爲各種國家社會問題形成激烈的爭論⑪。爭論的焦點之一，就是中國應行專制獨裁抑或民主。最近出現一項有關獨立評論編輯方針的文件，其中談到內政首重統一，強調「現在統一問題雖與歷代不同，然中心人物及武力亦不能免，在二三十年內，一方式的專制……一人或少數人的，公開的或隱諱的……是事實所必須」。它接著還有一段話說：「民治在中國之不能實行，全由中國無適宜於民治之經濟、社會及智識，倘統一能完成，建設卽可進行，而適於民治之環境自然產生矣。短期之專制反可成爲達到民治之捷徑。目前在中國大倡『天賦人權』、『主權民有』等理論不但無益，而且有損」⑫。這項文件明白

⑩ 同上。
⑪ 「引言」，獨立評論，第一號（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頁二～三。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八五。
⑫ 書信選，下册，頁五七四～五七五。

主張先行專制，再談民主，從筆跡判斷起草人應是蔣廷黻，又經過胡適的修改，但是它始終沒有在獨立評論刊出。獨立評論最初的主編是胡適，他顯然不能同意透過專制達成民主的論調。

蔣廷黻晚年十分肯定民主的價值，曾謂「民主政治是最有力的政治」，極權主義是違反中國傳統的，「我們必須堅持向民主道路前進」⑬。但是早在民國十五年的時候，他就在現代評論撰文，提出武力統一較國民會議統一爲優的意見。九一八以後舉行國難會議，他應邀前往參加，但是他認爲各方代表集會只能爲政府壯壯膽，實際無助於解決國難，同時他贊成梅思平在會中主張不即時立憲的提案⑭。等到民國二十二年閩變發生，他更明白的主張中國應先透過專制達成統一，因而引起一場獨裁與民主的論戰，胡適和他在這場論戰中站在完全對立的立場。

蔣廷黻看到閩變，認爲辛亥革命以後內亂太多了，中國不能再鬧革命了，所以主張先實行一段時期的專制，像英國的頓頭朝代（Tudor Dynasty）、法國的布彭（Bourbon）朝以及俄國的羅馬羅夫朝一樣，先把一個朝代國家（dynastic state）造成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談到中國過去幾千年的專制，他說第一，中國始終是朝代國家，沒有達成民族國家，一般人民的公忠是對個人或家庭或地方的，不是對國家的。第二，中國的專制一直摧殘皇室以外一切可作政權中心的階級和制度，皇室一倒，國家就成了一盤散沙，缺少可作新政權中心的階級。第三，在專制政體之下，中國的物質文明太落伍，一旦再有革命，外人就能漁利，我們就沒有抵抗的能力。總而言之，他認爲中國過去的專制君主沒有盡到歷史的職責，沒有做到建國的工作，滿清專制留給民國極壞的遺產，不够作革命的資本，所以中國的政權不統一，政府好不起來，每革一次命，就會造成一次更大的傷害。爲了擺脫這樣的情況，他相信中國暫時還不能革命，還得經過一段新的專制，先把國家建設成統一的民族國家⑮。

胡適讀了蔣廷黻的文章，便要推想三個問題：第一，專制是否建國的必要階段？第二，中國經過了幾千年的專制，爲什麼還沒有做到建國的歷史使命，還沒有造成一個民族國家？第三，中國的舊式專制既然沒有做到建國的職責，我們今後建國

---

⑬ 蔣廷黻，「國家的力量」與「中國的傳統與現代潮流」，見蔣廷黻選集（臺北文星書店，民國五十四年），第五册，頁九七五～九八二，第六册，頁一二七一～一二八四。

⑭ 蔣廷黻，「統一方法的討論」與「參加國難會議的回顧」，蔣廷黻選集，第一册，頁二一～二七，七五～七九。

⑮ 蔣廷黻，「革命與專制」，獨立評論，第八十號（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日），頁二～五。

是否還得經過一段新式專制？因此，他連續寫了兩篇文章，在第一篇文章中討論了前面兩個問題，在第二篇文章答覆第三個問題。綜合他的說法，建國需要統一的政權，但統一政權不一定只靠獨裁專制。舉英國爲例，其民族國家的形成，並不是全靠英國君主的力量，其他還有許多經濟社會文化的原因，譬如英國國語新文學的產生與傳播，牛津與劍橋兩大學的勢力，倫敦成爲政治、經濟的中心，紡織業的長足發展，以及中級社會的興起等等，原因既然如此複雜，所以不能單指「專制」是建國的必要條件。以中國的情形而論，中國原來在語言文字上是統一的，在歷史文化上是統一的，在政治制度（包括考試、任官、法律……等等）上是統一持續的，在這些條件上，中國兩千多年都够得上一個民族的國家。至於蔣廷黻所指的三種缺點，所謂一般人民對國家沒有公忠，中國專制沒有遺留可作新政治中心的階級，以及中國在專制政權之下物質文明太落伍，這些都是舊日的社會與政治的惡果，並不足以證明中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因此，胡適認爲中國的建國問題不是建設民族國家的問題，而是如何使中國的民族國家在現代世界裏站得住腳。⑯

談到新式專制的問題，胡適斷然反對中國還要經過一段新式的專制，反對像意大利或者蘇俄一類的領袖獨裁、一黨專政或者一階級的專政。他說他所以反對的理由，第一是他不相信中國當時有能專制的人，或能專制的黨，或能專制的階級；第二是他不相信中國當時有甚麼有大魔力的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和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的領導之下，造成專制的局面。他說，中國在幾十年之中，排滿的口號過去了，護法的問題過去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過去了，甚至於「抗日救國」的口號也還只够引起一年多的熱心。「在這個老於世故的民族裏，什麼口號都看得破，什麼魔力都魔不動，雖有莫索里尼，雖有希忒拉，雖有列寧、杜洛司基，又有甚麼幻術可施呢？」然後胡適從否定專制到肯定民主，他說根據他對幾十年世界政治的觀察，感覺民主憲政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不甚需要甚麼出類拔萃的人才，許多平庸的人一起參加政治，大家把常識湊在一起，就可以勉強對付。他說：「民主政治是常識的政治，而開明專制是特別英傑的政治。特別英傑不可必得，而常識比較容易訓練。在我們這樣缺乏人才的國家，最好的政治訓練是一種可以逐漸推廣政權的民主憲政」。⑰

第一回合的辯論之後，胡適和蔣廷黻接著有第二回合的辯論，同時還有其他學

⑯ 胡適，「建國與專制」，獨立評論，第八十一號（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頁二～五。
⑰ 胡適，「再論建國與專制」，獨立評論，第八十二號（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頁二～五。

者分別聲援。蔣廷黻看到胡適批評他的兩篇文章，寫了一篇「論專制並答胡適之先生」。他仍然不承認中國是一個民族國家，認爲中國人沒有國家民族觀念，只有地方觀念，只有割據意識。爲了消除地方割據，達成國家民族的統一，革命是沒有用的，因爲民國以來的歷史已經證明每革一次命，總是助長軍閥割據。代表制度和國會也沒有用，因爲一則中國知識份子對代表制度沒有信仰，二則軍人用一連兵就可以解散國會。所以蔣廷黻相信達成中國統一的「惟一的過渡辦法是個人專制」。他說他有三點理由。第一、中國的現狀是數十人的專制，必須用一個大專制來取消這些小專制。第二、破壞統一的是二等軍閥，不是人民，統一的問題就成爲取消二等軍閥的問題。二等軍閥既以握兵柄割據地方，只有用更大的武力才能打倒他們。同時中國人的私忠過於公忠，利用私忠的心理，也比較容易支持個人產生大武力。第三、舊專制之所以無濟於事，是因爲中國二千年雖有朝代的改變，但無政制和國情的改變，環境始終一樣。現在情形不同了，外國人除了給我們極大的壓力之外，還供給我們科學和機械，這兩個東西是新式專制可以用的，它們「就要改造中國，給他一個新生命」。⑱簡而言之，蔣廷黻除了繼續主張以新專制代替舊專制，並進而主張以大專制取消小專制，以更大的武力取消二等軍閥，以科學機械搞新式專制。

吳景超從中國歷史觀察，把內亂的過程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期從苛政到現狀推翻，可以稱爲打倒舊政權的時期，第二期從羣雄爭權至統一完成，可以稱爲創立新政權的時期，第三期自善政至和平恢復，可以稱爲建國時期。準此以論，他認爲自清室推翻以後，鬧來鬧去，還沒有跳出革命的第二時期，還是一個割據的時期，說不上建國的大事業。他說：「我們當前最大的問題是統一問題。國家統一之後，一切的建設計畫，才能實行。此時來研究建國的計畫，是無妨的，此時來談建設的實行，未免超越時代」。這表示他和蔣廷黻的看法一樣：中國還沒有統一，還談不到建國的工作。談到未來統一的途徑，他也和蔣廷黻的想法一致。他列舉歷史事實，斷言「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例外，統一是以武力的方式完成的」。他又說：「在羣雄割據的時期內，除卻武力統一的方式外，我們看不出還有什麼別的方式，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雖然現在有人提倡以開放政權的方式來統一，但是據我看來，開放政權以後，一部份的官僚，一部份的政客，一部份以學者而兼政客的人，可以

⑱ 蔣廷黻，「論專制並答胡適之先生」，獨立評論，第八十三號（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頁二～六。

躊躇滿志了，但於統一是無補的，對於大多數人民的福利，更是風馬牛不相及」。⑲吳景超和蔣廷黻都爲獨立評論寫稿，抗戰時在重慶都參與新經濟月刊的編輯撰寫工作，勝利以後在南京又都參與世紀評論，可說是長期志同道合的朋友。

面對蔣、吳二人的主張，胡適提出了反駁。他不能同意蔣廷黻欲以更大的武力打倒二等軍閥的說法。他說當時的二三等軍閥，實不够中央軍隊的一打，兩個月削平了桂系，六個月打倒了閻馮，足見二等軍閥算不得難對付。問題所在，還是二等軍閥打倒之後，「統一在那裏？和平又在那裏」？他說：「『武力統一』，『用更大的武力打倒二等軍閥』，這種理想，當然有人在那兒夢想實現的，用不著我們去教猴子上樹」。他也不同意吳景超的歷史分期觀點。他說歷史是「不再來的」，一切公式比例，都不能普遍適用。如果相信中國歷史沒有例外，在割據的時期都是以武力完成統一，進而以爲「今日除了武力統一之外，沒有別的方式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這未免太拘泥於歷史的例證了」。然後胡適借蔣、吳二人的話加以引申，指出武力統一的障礙主要有三點，一在意態，一在物質狀況，一在領袖人才。所謂意態，並不是蔣廷黻所說「中國人的頭腦裏有省界」，而是各種社會政治意識思想的矛盾衝突。所謂物質狀況，也不只是蔣廷黻所說的貧窮，還有中國疆域之大以及交通的不方便。至於够資格武力統一的領袖人才，蔣、吳二人都說還沒有出現，胡適也認定如此。由於這三方面的問題，武力的使用很困難，武力統一的希望很脆弱，所以胡適要在武力統一之外，尋求其他統一的途徑。⑳

爲了尋求其他統一的途徑，胡適先要指出當初中國統一破壞的原因。他認爲中國統一破壞的關鍵在太平天國。在太平天國以前，督撫都不用武力，各地駐軍甚少，國家的統一全靠制度的運用，官吏的任免權在中央，科舉是全國一致的，升遷調轉有一定的資格限制，文官統轄武官也是一致的。太平天國之亂以後，這些制度就被打破了，逐漸形成「內輕外重」、武力割據的局面。等到辛亥革命以後，維繫統一的制度更加崩壞，中央沒有任官權，沒有軍權，沒有賦稅權，各省督軍都自由招兵，自由作戰，自由扣留國稅，自由任命官吏，最後並演變成有力的督軍干預中央的政治，中央政府也變成了軍人的附屬品。進而談到國民革命軍北伐，胡適認爲這是一個新局面。他說，北伐統一的中心在國民黨，要以黨治軍，以黨當政，黨權高於一切，這一套的新組織與新紀律，在當時眞有「無堅不摧」的威風，無組織無

⑲ 吳景超，「革命與建國」，獨立評論，第八十四號（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七日）頁二～四。
⑳ 胡適，「武力統一論」以及「政治統一的途徑」，獨立評論，第八十五號（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十四日）頁二～七，第八十六號（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頁二～七。

紀律的舊勢力，都抵不住這潮流的震撼。然而他筆鋒一轉，又指出這一回的新統一裏也有不少的離心力。他說，政權屬於黨，而黨不幸先分裂了，一分爲國共，再分爲各派，三分爲以個人爲中心的各系。同時因爲黨內原來沒有設計分派的處理方法，沒有準備用和平法律手段轉移政權的方法，所以到分裂時就互相鬪爭，鬪爭的手段又各各依靠一部份的軍人，用機關槍對打。對打的結果，有新起的軍事領袖，比舊日北洋軍閥高明，也還能保持最優勝的勢力，「然而那分裂的局勢終無法收拾；第一是黨軍無法解決，第二是私怨無法消滅，從黨軍變到個人恩怨，從黨中心變到個人中心，越變離心力越大了」。㉑這一段討論，顯示在胡適的心目之中，武力不僅無助於統一，而且是破壞統一的根本原因。

武力既不可恃，胡適仍以中國統一的希望，寄託於一個聯貫中央與各省的中央政府制度，而且以國會的設立作爲一個可行的辦法。他說，舊日的統一全靠中央任命官吏去統治各省，如今既然做不到了，統一的方式便應反其道而行，要各省選出人來參加中央的政治，來監督中央，幫助中央統治全國，這是國會有助於統一的根本意義。蔣廷黻曾說國會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主義和代表制度」，這種制度從理想說比任何專制都好，從事實上看絕不能行，因爲「人民不要選舉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麼人。代表在議會說的話不過是話而已」。他說：「只要政權在軍人手裏，如現在這樣，又只要民衆樂爲軍人所使用，又如現在這樣，你的國會有一連兵就可解散了」。胡適批評蔣廷黻的這些話「都是過慮，有成見的過慮」。然後他一點一點地反駁說：「第一、人民最不要納租稅，然而他也居然納租稅，豈非怪事？所以蔣先生也不必過慮人民不要選舉代表。第二、議會能有多少權力，如今談不到。不過我們前幾天還看見報上記載著，立法院『在悲憤中』勉強通過了一萬萬元的公債案。一個確然『不代表甚麼人』的立法院也會『悲憤』，蔣先生也許可以看見一個代表全國的議會發起大『悲憤』來制止內戰，誰敢保沒有這一天呢？一連兵誠然可以解散國會，正如一個警察可以封閉你我的獨立評論一樣容易。然而曹錕要做大總統，他用一連兵就可以包圍國會了，何必要花五千元一票去賄選呢？馬君武先生曾說：曹錕肯花五千元一票去賄選，正可以使我們對於民主憲政抱樂觀，因爲那個國會的選舉票在曹錕眼裏至少還值得四十萬元的代價。況且有了賄選的國會，也就可以有賄不動的國會；有了一連兵解散得了的國會，也就可以有十師兵解散不了的國會」。這樣針鋒相對地批駁了蔣廷黻對國會的輕視疑慮之後，胡適最後再肯

㉑ 胡適，「政治統一的途徑」。

定國會的意義說，國會是象徵全國全民族的機關，「各省要搗亂，就請到國會裏來大家一塊兒搗亂。各省要建設，就請到國會裏來大家一塊兒建設。無論如何，總比『機關槍對打』要文明一點。讓各省的人到中央來參加全國的政治，這是養成各地方向心力的最有效的一步」。他又說：「國會是代表全國的議會，是一個有形的國家象徵，人民參加國會的選舉，就是直接對那個高於一切的國家盡義務。現在全國沒有一個可以代表整個國家的機關，也沒有一個國家（原文如此，疑漏機關二字）可以使人民有參加干預的機會，人民又從何處去報效他的『公忠』呢」？㉒

胡適和蔣廷黻、吳景超辯論的時候，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錢端升以筆名瑞昇在東方雜誌發表「民主政治乎？極權政治乎」？也主張獨裁極權。錢端升原來對於民主政治希望無窮，斷定凡違背民主而獨裁的政治，終將歸於無成。然而觀察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各國政治的發展，他發現民主政治得不到無產階級的信任，又無法應付現代國家的經濟問題，漸有衰頹的趨勢，而在俄、意、土、德等實行獨裁的國家，則都成功地處理了各種政治、社會、經濟問題。然後他分析整個國際形勢，認定新的國際關係基本上是經濟民族主義的競爭，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勢必於最短期內發展工業，而較發達的，則勢必求維持它們比較優越的地位。在這種尖銳的競爭之中，他相信獨裁政治之下的統制經濟是敏捷不浪費的制度，將為大家所採納，民主政治之下的自由經濟是比較遲鈍浪費的制度，將為大家所共棄。談到中國的未來，他說中國的急務也是要急起直追，儘速發展為一個有實力的國家；為著成為一個有實力的國家，中國應經的途徑與別國無異，即須先有一強有力的政府，以增進人民的知識健康，增進人民的生產能力。他進一步分析說：「欲有一強有力的政府，則提倡民主政治不但是緩不濟急，更是緣木求魚。欲求達到英美那樣的民治，即在最佳的情形之下，也非十年二十年所可辦到的。而且即使得到英美那樣的民治後，國家也是弱而無力，不足與別的民族作經濟上的競爭」。因此，他相信中國所需要的，也是一個有能力、有理想的獨裁，以「深得民心的獨裁制度」，使國家具有極權國家的力量，努力在一、二十年內使沿海各省高度工業化，並使內地農業與沿海工業相依輔，「祇有這樣，我們才能於下次世界大戰時一方可以給敵人以相當的抵抗力，而一方又可以見重於友邦」。㉓蔣廷黻和吳景超主張專制獨裁，主要著眼點在於國內政治的發展，錢端升從國際競爭的關係著眼，無疑為獨裁極權的主張，增加

㉒ 同上。又見蔣廷黻，「論專制並答胡適之先生」。
㉓ 瑞昇，「民主政治乎？極權政治乎？」，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一號（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一日），頁一七～二五。

了一個重要論點。

胡適認爲錢端升的文章，是一年中討論民主獨裁的一篇「最有條理又最懇摯動人的文章」，但是所謂民主政治的衰頹和經濟的民族主義，都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錢端升說「歐戰的結局實爲民主政治最後一次的凱旋」，胡適則說「歐戰的終局實在是民主政治進入一個偉大的新發展的開始」。所謂新發展，是指民主政治無論在量和質的方面，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更有進步。在量的增加方面，胡適指出戰後民主政治差不多征服了全歐洲，俄、德、奧、土四個最根深柢固的帝制被顛覆了，西班牙革命了，南斯拉夫的專制國王亞歷山大被刺，這些都是實際的例子。在質的改進方面，胡適認爲最可注意的，就是無產階級勢力的驟增和民主政治的社會化的大傾向。就前者的實例而言，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和英國勞工黨兩度執政，都是大戰以前很少人敢於想像的事。後者的實例更多，可說各國的「社會的立法」，都是民主政治社會化的表現。胡適強調看待民主政治不宜過於狹窄，不能說某種形式上的不合英美範型，就是民主政治的衰頹。如果放大眼光觀察世變，十八九世紀的民主革命和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社會主義運動，並不是兩個相反的潮流，而是一個大運動裏兩個相連貫又相補充的階段，從這樣的理解去看歐戰結束以後十幾年的歷史，就會發現「民主政治不但不曾衰頹崩潰，竟是在量的方面有了長足的進展，在質的方面也走上了一條更偉大的新發展的路」。㉔ 在這一段討論裏，值得注意的是胡適未將蘇俄無產階級專政歸入獨裁極權，反而視之爲與民主政治配合的新發展，在本文的後面，還要進一步探討他對蘇俄和共產主義的看法。

胡適不同意錢端升的另一說法，即所謂「經濟的民族主義」。他說錢端升把「經濟的民族主義」認作需要統制經濟的主要原因，而統制經濟的要求又是獨裁「無可倖免」的主要原因，這樣的推論忽略了幾方面的事實。他說，第一、「經濟的民族主義」不是每個國家都能做到，美國、俄國和不列顛帝國在天然資源上和經濟組織上可以做到，日本、意大利、法國、德國受天然資源或歷史的限制，原料的供給比不上上述三國，經過很大的努力才有高度的工業化。但是因爲他們不能不用侵略或傾銷一類的方法來補救天然的缺陷，所以他們的「經濟的民族主義」都成爲國際戰爭的地雷，將來一觸即爆發。除了以上七國，世界無一國能有「經濟的民族主義」的資格，中國地大而物不博，重工業的發展尤其希望很少。第二、在歐洲已有

㉔ 胡適，「一年來關於民主與獨裁的討論」，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一號（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一日），頁一五～二三。

一些小國家試行各種自由組合的合作制度，如消費合作、生產合作、運輸合作等，他們的成績很好，但是他們的方法並不是獨裁之下的統制經濟。第三、英美民治國家近年也有走計畫經濟的傾向，但與獨裁之下的統制經濟仍不相同，因爲人民仍然可以換國會，仍然可以換總統，計畫經濟實爲一種知識階級、資產階級、勞工階級三面合作的民主政治的社會化。第四、英美行政權的增高和計畫經濟的運動，都是爲了要救濟國內的經濟恐慌，不是爲了「經濟的民族主義」的推進，更不是爲了預備民族間的鬪爭。㉕

總之，胡適認爲錢端升把「民主政治」的定義下得太狹窄，所以不能承認歐戰後的民治主義的發展，又把「經濟的民族主義」看得太普遍，所以武斷所有國家都不能免於統制經濟，也就不能倖免於獨裁的政治。最後胡適更從三點否定錢端升所謂中國因爲需要工業化所以需要獨裁的說法。第一、中國沿海缺少許多基本條件如煤、鐵等原料，所以並不容易像錢端升所希望的成爲工業化的地區。第二、中國是沒有海軍的國家，所以即使沿海可以發展爲工業區，也沒有保護的能力。第三、中國的工業化不能單靠政府權力無限的增加，無限的權力不能憑空添出資本，不能隨便印紙作現金，不能從空中生出許多必需的專門人才來，不能在短期中征服一個放任慣了的無政府態度的民族。一言以蔽之，胡適認爲錢端升所謂中國需要獨裁沒有充足的理由。㉖

從民國二十二年年底到二十三年年底，胡適和朋友們辯論民主與獨裁，經過的情形大致如上，但是除了幾篇主要文章之外，另外還有不少文章，有的聲援蔣廷黻等人的獨裁，有的支持胡適的民主，㉗此處不能一一列舉。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意胡適的人只說民主難以救急，不同意蔣廷黻等人的人，則在反對獨裁之外，還懷疑有人曲意逢迎。傅斯年最不滿意蔣廷黻的文章，乃謂「此公雖邀西府之垂青，實已自棄其 moral 力量。中國雖至今日猶有三分廉恥，此則繫於二三人之努力。曾滌生所謂『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傾向而已』是也」。㉘蔣廷黻寫了幾篇文章，於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到牯嶺見了蔣委員長，然後啟程取道西伯利亞去蘇俄考察㉙。

㉕ 同上。
㉖ 同上。
㉗ 贊成胡適主張的，還有常燕生、壽生、胡道維、張佛泉等人的文章，分別見獨立評論與國聞週報等刊物。
㉘ 「傅斯年致胡適」（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十九日），書信選，中册，頁二三八。
㉙ 根據蔣廷黻自己的回憶，他在獨立評論和大公報的文章，引起蔣委員長的注意，隨後他見過蔣委員長三次，第一次是民國二十二年夏天在牯嶺，第二次是民國二十三年初在南昌，第三次是同年七月在牯嶺，以後他便去蘇俄考察。見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頁一四五～一五三。

考察期間，他和胡適通信，寫遊歐見聞在獨立評論發表，然後在民國二十三年年底又寫信給胡適說：「我對獨裁雖發表了不少贊成的言論，我此次出來當然不抱定主見而不加以考察。所以你的勸告我自然願意接受。這不是說，我從此就放棄這種主張。這是說：我絕不爭意氣；如果我考察的結果證明我錯了，我一定認錯；不然，我自應該更努力的提倡」。進而談到獨立評論的內容主張，蔣廷黻又這樣寫道：「你對我的政治偏右不贊成，對我的經濟偏左也不贊成嗎？獨立的政治主張已夠灰色了，經濟簡直沒有主張。投經濟稿子的人似乎更帶書生氣，更不敢有所主張，我們因此喪失一個很好指導輿論的機會」㉚。所以，獨立評論的內容主張，在同人中一直有不同的意見，蔣廷黻出國以後，胡適顯然希望他借考察的機會，再思考民主和獨裁的是非。

三、

胡適和蔣廷黻等人有關民主和獨裁的爭論，到民國二十三年年底大致已經告一段落，不料因為國民黨領袖蔣委員長和汪精衛的一則通電，又引起新的波瀾，胡適又要和另外一些朋友再作進一步的討論。

汪蔣通電發表於十一月二十七日。由於江西福建剿共軍事告一段落，國民黨將開五中全會，汪蔣通電列舉實際可行標準五條，明訂中央與地方關係，以求消除隔閡，達成全國和平統一。全電要旨，尤在「和平統一」四字，所以電文開始就說：「今日救國之道，莫要於統一，而實現統一，端在乎和平，吾人當此歷史上空前未有之國難，若非舉國一致，精誠團結，避免以武力為解決內政之工具，消弭隔閡，促成全國真正之和平統一，實無以充實國力，樹立安內攘外之根基」。另外在電文結尾更有一段話說：「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不取決於武力，不獨中央地方間對此原則應恪守弗渝，卽人民與社會團體間依法享有言論結社之自由，但使不以武力及暴動為背景，則政府必當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蓋以黨治國，固為我人不易之主張，然其道當在以主義為準繩，納全國國民於整體國策之下，為救國建國而努力，決不願徒襲一黨專政之虛名，強為形式上之整齊劃一，而限制國民思想之發展，致反失訓政保育之精神。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義俄政制之必要

㉚ 「蔣廷黻致胡適」（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八日），書信選，中册，頁二五七，二六一～二六二，二六四～二六五。後來蔣廷黻回憶，他經過這次歐洲之旅，覺得共黨及納粹的極權主義思想太積極，自由主義又太鬆懈，但是他向獨立評論讀者保證，「儘管自由主義推行困難，有些地方不合時宜，但是最後勝利還是屬於它的」。見蔣廷黻回憶錄，頁一七〇。

與可能也」。同日蔣委員長接見日本大阪每日新聞記者，在談話中也表示中國與義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國情不同，所以無獨裁必要，他本人腦筋中只有中國之國家與個人之責任，尤未考慮做大總統㉛。以國民黨過去有胡漢民主張「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以中國當時處於共黨與日寇的內憂外患之中，以國際間當時共產與法西斯浪潮之盛，汪蔣通電和蔣的談話，都是難能可貴的政治文件，所以胡適看到以後，連寫兩篇響應的文章。

兩篇文章中，一篇特別針對汪蔣通電中所說的言論結社自由而發。胡適在這篇文章裏提出保障自由的五條辦法。第一，政府應該明令全國，凡不以武力及暴動為手段的結社與言論，均當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第二，政府應該明令中央與各省的司法機關，從速組織委員會來清理全國的政治犯，結束一切證據不充分的案件，釋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論犯罪的拘囚，並且應該明令一切黨政軍機關不得因思想言論逮捕拘禁人民。第三，政府應該即日禁止公安與司法機關以外的一切機關隨意逮捕拘押人民。第四，政府應該明令取消一切箝制報紙言論與新聞的機關。第五，領袖蔣公應該早日停止一切「統制文化」的迷夢。胡適說他提這五條辦法，是為了充實汪蔣通電中的原則。他最後強調說：「可是這些具體事項若不能做到，他們的原則就難叫我們信仰了」㉜。

胡適另外一篇文章套用汪蔣通電中的最後一句話，便以「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為題目。言及無獨裁的必要，胡適還是重覆他原來和蔣廷黻、吳景超、錢端升等人打筆仗時所持的論點。第一，中國不一定能像錢端升所設想的那樣工業化，而且中國即使工業化，也決不是單靠政府的力量，所以說政府獨裁若是為了工業化，便沒有獨裁的必要。其次是中國也不是像蔣廷黻、吳景超所說的需要武力統一，許多「新意態」（新思想潮流）的力量往往超過武力，「反對獨裁」、「打倒獨裁」也是一種「新意態」，如果不加以重視，必欲藉獨裁達成武力統一，結果可能適得其反。論及無獨裁的可能，胡適也是舊話重提，強調他不相信中國有能獨裁的人，或能獨裁的黨，或能獨裁的階級。他不相信中國當時有甚麼具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制的局面。同時他不相信中國民族當時的知識經驗，够得上幹那需要高等知識與技術的現代獨裁政治。這樣重覆他的舊論點之後，胡適作結論

㉛ 大公報（天津），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㉜ 胡適，「汪蔣通電裏提起的自由」，獨立評論，第一三一號（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頁三～六。

說：「在這個時候，不少的學者和政客鼓吹獨裁的政治，而他們心目中最有獨裁資格的領袖卻公然向全國宣言：『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義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只此一端已可證中國今日實無獨裁的可能了。這個宣言的發表，表示在今日有發表這個宣言的必要。而在今日何以有這樣一個宣言的必要呢？豈不是因爲『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環境與時代）都不容許『義俄政制』的產生嗎」？他又說：「我們很誠懇的贊成這個宣言，並且很誠懇的希望作此宣言的人不要忘了這樣嚴重的一個宣言」㉝。

胡適連寫兩篇文章之後，這回和他針鋒相對辯論的，是他獨立評論的另一位同事，也是他一生最難得的朋友丁文江㉞。前文曾經提到在獨立評論創辦之初，丁文江曾經希望國民黨團結以赴國難，胡適則對國民黨感到失望，認爲民間應該發展結合成一股監督制衡政府的力量。民國二十二年夏天丁文江先到美國，然後經英國、瑞典、德國到蘇俄。從八月底到十月底，他在蘇俄各地考察旅行，並將所見所聞的一部分寫成旅行記發表於獨立評論，極熱忱地希望蘇俄共產主義試驗的成功。同時他發表「我的信仰」一文，其中提到他不迷信獨裁，也知道獨裁的流弊，但是他對於平民政治也沒有任何迷信，因爲他相信作領袖的人總要有爲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於一時的宗教心，而這種宗教心特別豐富的人總是少數。他又說他不贊成共產黨式的革命，但是他同情於共產主義的一部分，認爲蘇俄的口號「各人盡其所長來服務於社會，各人視其所需來取償於社會」是一個理想的目標，甚至他相信最富於宗教心的莫過於共產黨㉟。由於這樣的背景，所以丁文江要批評胡適一味否定獨裁主張民主的說法。

丁文江認爲獨裁如不可能，民主更不可能，因爲民主需要普選，實行民主憲政有成績的國家，都是政治經驗豐富的民族，這兩個基本條件，中國都不具備。他解

㉝ 胡適，「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獨立評論，第一三〇號（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九日）頁二～六。

㉞ 民國二十年八月，胡適應丁文江夫婦之邀，帶了兒子胡祖望到秦皇島去玩。八月十五日夜，胡、丁二人在海邊談到深夜，同聲高誦元微之送白樂天的兩首絕句，一曰「君應怪我留連久，我欲與君辭別難。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一曰「自識君來三度別，這回白盡老髭鬚。戀君不去君應會，知得後回相見無」？第二天丁文江用元微之原韻做了兩首詩送給胡適，一曰「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留連別更難。從此聽濤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歡」。一曰「逢君每覺青來眼，顧我而今白到鬚。此別原知旬日事，小兒女態未能無」。四年半以後，丁文江死在長沙，胡適也用元微之的原韻寫了兩首詩，追念「這一個人生最難得的朋友」。詩曰：「明知一死了百願，無奈餘哀欲絕難！高談看月聽濤坐，從此終生無此歡」！又曰：「愛憎能作青白眼，嫵媚不嫌虬怒鬚。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風流一代無」。見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八〇～八二。

㉟ 同上，頁九一～一〇七。丁文江，「我的信仰」，獨立評論，第一百號（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頁九～一二。

釋說，民主政治要根據普選，即凡是成年人都要有投票選舉的能力，但是中華民國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或是七十五以上都是不識字的，他們不能行使選舉權，這就是中國無法實行普選，也就不可能實行民主政治的原因。同時經驗比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棄了民主政治，採用了獨裁制度，足見民主憲政不是胡適所說的那樣幼稚。蘇俄和意大利不容易學，英法美比蘇俄和意大利更要難學。這樣分析之後，丁文江的初步結論是「實行民主政治，一定要有普通的教育，完備的交通，健全的政黨，寬裕的經濟。實行獨裁政治所需要的條件，或者不至於如此苛刻」。胡適曾說「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不甚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於集思廣益，使許多阿斗把他們的平凡常識湊起來也可以勉強對付」。丁文江則說他太樂觀了，「領導四萬萬個阿斗，建設一個新的國家」，固然是非同小可的事，但是「要四萬萬個阿斗自己領導自己」，新的國家永久建設不起來。討論了民主的不可能，丁文江再談民主的不必要。他說：「中國的政治完全在革命之中，而且在內戰期中。在這個狀況之下，民主政治根本還談不到，獨裁政治當然是不可避免的」。他又說：「豈但我們的政治沒有脫離革命的方式，我們的國家正遇著空前的外患，——不久或者要遇著空前的經濟恐慌。在沒有渡過這雙重國難以前，要講民主政治，是不切事實的」㊱。

民主既不可能，又不必要，丁文江認定中國需要獨裁的意思是很明確的，所以他斬釘截鐵的說：「大家應該努力的還是使目前在中國不可能的獨裁，在最短期內成爲可能，而這種努力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放棄民主政治的主張」。談到獨裁，他特別指出胡適也說美國「到了近年的非常大危機，國會授權給大總統，讓他試行新式的獨裁」。他說中國在最短期內所應實行的，正是這種「新式的獨裁」。進而他爲「新式的獨裁」提出四個條件。第一，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爲利害。第二，獨裁的首領要徹底了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第三，獨裁的首領要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第四，獨裁的首領要利用目前的國難問題來號召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㊲。

胡適讀丁文江的文章，仔細讀了兩遍，很感覺失望，認爲丁文江不了解英美的民主政治，也誤解他所說的民治是幼稚園政治的話。他說英美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並不干擾人民日常的各種活動，但是每隔一段時間總是提供一個機會，讓人民到

㊱ 丁文江，「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獨立評論，第一三三號（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頁四～六。
㊲ 同上。

選舉的場所想想國家大事，然後對執政黨投贊成票或反對票，在獨裁國家，人民只可以贊成執政者，必不容表示反對的意見。他說：「民治國家的阿斗不用天天干政，然而逢時逢節他們干政的時候，可以畫『諾』，也可以畫『NO』。獨裁政治之下的阿斗，天天自以爲專政，然而他們只能畫『諾』，而不能畫『NO』。所以民主國家的阿斗易學，而獨裁國家的阿斗難爲。民主國家有失政時，還有挽救的法子，法子也很簡單，只消把『諾』字改做『NO』字就行了。獨裁國家無權說一個『NO』字，所以丁在君先生也只能焚書告天，盼望那個獨裁的首領要全知全德，『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爲利害，要澈底了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要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萬一不如此，就糟糕了」㊳。

胡適比較了民主與獨裁，批駁了丁文江對獨裁的期望之後，仍然意猶未盡，還要進一步說明獨裁之害，並且嚴重地警告丁文江不可助紂爲虐。他說，獨裁國家往往用一小部分阿斗作長期專政的工具，像俄國的二百萬共產黨，意大利的四百萬法西斯黨。這些阿斗自以爲是專政的主人，天天以「幹部」自居，天天血脈僨張的擁護獨裁，壓迫異己，誅夷反動。獨裁者則充分利用他們的劣根性，給他們糖吃，給他們血喝，使他們死心塌地的喊萬歲，替他剷除反動，替他擁護獨裁。然後他以很重的語氣警告丁文江：「獨裁政治成績的大小，和獨裁政制之下民眾與國家受的福利或禍害，往往繫于這二百萬或四百萬的『專政阿斗』的程度和經驗。這是一個國家的生死關頭。學者立言，爲國家謀福，爲生民立命，在這種緊要關頭，是可以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豈可以用『實行獨裁政治所需要的條件或不至於如此的苛刻』一類模稜論調輕輕放過呢」？他又說：「今日提倡獨裁的危險，豈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簡直是教三歲孩子放火。錢端升先生說：『我們更要防止殘民以逞的獨裁之發生』。丁在君先生也說：『大家要打倒的是改頭換面的舊式的專制』。我可以斷斷的預言：中國今日若眞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決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專制」㊴。

胡、丁二人的文章出現之後，又有很多人參加民主與獨裁的討論，其中跟著胡適批評丁文江的人不少。陶孟和視丁文江爲「畏友」，他感覺丁的文章有事實，有理論，有主張，條理淸楚，文筆流暢，實在娓娓動人。「如果讀者接受丁先生的假定，遵循他的邏輯，再承受他的文字的催眠，我敢說他一定會變成一個丁氏獨裁主

㊳ 胡適，「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獨立評論，第一三三號（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頁七～九。

㊴ 同上。

義的信仰者」。但是他不肯自居「丁氏獨裁主義的信仰者」，所以要對丁的文章「戮幾個窟窿。」拿民主和獨裁作比較，他相信民主政治可以避免革命的痛苦，不必用激烈的外科手術。民主像一個金字塔，基礎比較安穩，獨裁則像倒立的金字塔，一旦獨裁者不幸，不能行使他的職務，金字塔便倒了。吳景超曾經主張武力統一，曾是胡適批評的對象，現在也有一篇文章，把民主和獨裁的討論分成三方面。第一是中國現在實行的是一種甚麼政治？是獨裁政治？還是民主政治？這是一個事實問題。第二是大家願意要一種甚麼政治？這是一個價值問題。第三是如何達到大家所願要的政治？這是一個技術上的問題。他說他當初強調武力統一，完全是一種事實問題或技術問題的討論，如果把獨裁政治和民主政治當作一種價值的選擇，他和胡適的意見是相同的，是贊成民主政治的。陳之邁也發表一篇「民主與獨裁的討論」，把各方的意見作了一番綜合分析。談到他個人的看法，他借用汪蔣通電中「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而不取決於武力」的話，認定「中國的現狀絕對沒有瞎著眼去學人家獨裁的道理」，而應切實抓住現有的帶有民主色彩的制度，抓住民主政治的根本，像國民黨的全代會和民國二十年的國民會議這些已能代表部分民意的機關，都應該努力使他成功㊵。

同時陶希聖有「民主與獨裁的爭論」一文，似乎代表一部分國民黨的立場，指出胡適所主張的民主政治，很顯然的是議會政治，「如果以議會政治論和國民黨相爭，國民黨內沒有人能夠同意」。陶希聖回顧民國十三、十四年國民黨的歷史，談到孫中山先生民國十四年北上時主張開國民會議，說是國民黨內民主派的一個有力的理論。但是他說，開國民會議的主張，與議會政治的主張不同，參加國民會議的團體，是要在國民革命運動指導之下的。談到國民黨先行總理制以總理爲大元帥，總攬軍政大權，再於民國十三年改組時於總理之下設中央執委會，改大元帥府爲國民政府，取委員制，陶希聖說這是國民黨內領袖制與委員制之爭的由來，但是無論是領袖制和委員制，都與議會政治無關，即令大權在個人，也與議會政治相差很遠，即令按照建國大綱召開國民大會，那個誓行三民主義的縣民代表會議，也與多黨議會不同㊶。

㊵ 陶孟和，「民治與獨裁——對於丁文江先生『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的批評」，國聞週報，第十二卷第一期（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一日），頁一～四；吳景超，「中國的政制問題」，獨立評論，第一三四號（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六日），頁一七～一九；陳之邁，「民主與獨裁的討論」，獨立評論，第一三六號（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頁四～一一。

㊶ 陶希聖，「民主與獨裁的爭論」，獨立評論，第一三六號，頁一一～一二。

丁文江接著又寫了一篇「再論民治與獨裁」，批評到陶夢何（孟和）的說法，也批評到吳景超的所謂價值選擇，但是他主要的討論是針對胡適。他說他原來的論點是獨裁政治和民主政治在當時的中國都不可能，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獨裁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更大，可是胡適和別人的文章，都沒有提出任何理由說他這一論點有錯。胡適文章裏說到國家的生死關頭，學者可以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今日提倡獨裁的危險，豈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簡直是敎三歲孩子放火」。丁文江針對這段話說：「胡適之先生忘記今日中國的實際了。『猱』也罷，『三歲孩子』也罷，木已經升了，火已經放了，我們敎不敎是毫無關係的。我們的責任是使這種火少燒幾間有用的建築，多燒幾間腐朽的廟堂。尤其是如何利用這把火，使得要吞噬我們的毒蛇猛獸，一時不能近前」！接著丁文江又提到胡適所說「中國今日若眞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決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專制」。他說：「這話也錯了。中國今日的政治原來是『舊式專制』。胡適之先生難道忘記了他自己『論汪蔣通電所得的自由』那篇文章嗎？他所列舉的事實那一件不是可以證明『舊式專制』的存在？在這種狀況之下，單主張民主政治，反對獨裁，能夠發生任何的影響嗎？若是國家沒有外患的壓迫，我們可以主張革命，可以主張——如吳景超先生所說的——用教育的方式和平的走上民主政治的路。現在這兩種方法都是不能實現的，都是緩不濟急的。唯一的希望是知識階級聯合起來，把變相的舊式專制改爲比較新式的獨裁」。此外，丁文江還舉了一些實際的例子，證明中國的專制是不澈底的，國民黨的專政是假的。他說：「我們飽嘗專制的痛苦，而不能得到獨裁的利益。新式的獨裁如果能夠發生，也許我們還可以保存我們的獨立。要不然只好自殺或是做日本帝國的順民了」㊷。

在各方陸續參加論戰的時候，胡適到香港、兩廣去了五個星期，回到北京又因感冒在床上睡了五、六天，然後因爲大公報催寫星期論文，才翻閱報紙雜誌，讀到

㊷ 丁文江，「再論民治與獨裁」，獨立評論，第一三七號（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頁一九～二二。文中提及胡適所寫「論汪蔣通電所得的自由」，應爲「汪蔣通電裏提起的自由」。丁文江證明國民黨的專政是假的那一段話說：「九一八事變剛發生的時候，有一位反對國民黨的朋友對我說：『蔣介石一定和日本人妥協，國民黨一定要賣國了！』我回答他道：『我希望你這話是眞的。但是我恐怕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二十年（一九三一）十一月胡適之先生寫一封長信給宋子文先生，主張及早和日本人交涉。我告訴他道：『我是贊成你的主張的。可是國民黨的首領就是贊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爲他們的專政是假的。』這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胡適後來爲丁文江寫傳，重引這一段話，說「這一段是很傷心的話。在君在這裏很感慨的指責國民黨的專政是『假的』，是舊式的專政，而不是他所夢想的『新式的獨裁』。他的『新式的獨裁』的第一個條件是『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爲利害』。九一八事變之後，政府的首領不敢及早交涉，也不能及早交涉，就是不能『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爲利害』，就是夠不上『新式的獨裁』的第一個條件」。見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一〇六～一〇七。

許多辯論民主與獨裁的文章㊸。讀過這些文章之後，他寫了一篇「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裏求得一個共同的政治信仰」發表他的感想。他同意吳景超和陳之邁的說法，以較多的文字批評了陶希聖的論點，但是沒有提丁文江的文章。陶希聖說：「如果以議會政治論和國民黨相爭，國民黨沒有人能够同意」。胡適反駁說：「我們現在也可以明白告訴陶希聖先生和國民黨的朋友，我們現在並不願意『以議會政治論和國民黨爭』，因爲依我們的看法，國民黨的『法源』，建國大綱的第十四條和二十四條都是一種議會政治論。所以新的議會決定的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省參議會、縣參議會等，都是議會的幾種方式。國民黨如果不推翻中山先生的遺教，遲早總得走上民主憲政的路。而在這樣走民主憲政的路程上，國民黨是可以得著黨外關心國事的人的好意贊助的」。他緊接著又說：「反過來說，我們恐怕今日有許多求治過急的人的夢想領袖獨裁，是不但不能得著黨外的同情，還可以引起黨內的破裂和內訌的。憲政有中山先生的遺教作根據，是無法隱諱的；獨裁的政制如果實現，將來必有人抬出中山遺敎來做『護法』、『救黨』的運動。求統一而反致分裂，求救國而反增加國家的危機，古人說的『欲速則不達』的名言是不可不使我們三思熟慮的」。最後他呼籲無論黨內黨外，都應該平心靜氣，以汪蔣電文中「國家問題取決於政治而不取決於武力」爲「坦坦大路」，爲「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他說：「黨內的人應該尊重孫中山先生的遺敎，尊重黨內重要的領袖的公開宣言，大家努力促進憲政的成功；黨外的人也應該明白中山先生手創的政黨是以民主憲政爲最高理想的，大家都應該承認眼前一切『帶民主色彩的制度』（如新憲法草案之類），都是實行民主憲政的步驟，都是一種進步的努力，都值得我們的誠意的贊助使它早日實現的」㊹。

這次民主與獨裁的新爭論，主要對手原來是胡適和丁文江，但是胡適在這篇最新的文章中沒有再批評丁文江，而且兩人此後也沒有再作這一方面的公開辯論，這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發展。丁文江比胡適大四歲，因陶孟和的介紹而相識，時間大約在歐戰巴黎和會之後，以後兩人就成了好朋友，在一起辦努力週報，在一起辦獨立評論。丁對胡個人更是愛護備至，曾勸他少喝酒，並暗中每月貼十元幫助胡府遷

㊸ 胡適，「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裏求得一個共同的信仰」，獨立評論，第一四一號（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頁一六～一九。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以下簡稱年譜），第四册，頁一三二〇～一三四四。

㊹ 胡適，「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裏求得一個共同的信仰」。

居一處比較舒適的住所㊺。在這次辯論之中，胡適批評丁文江的第一篇文章，語氣是很重的，而且他還有信責備丁文江㊻。接著丁文江寫「再論民治與獨裁」，措辭也是十分嚴厲，並沒有因爲好朋友的關係，而能稍留餘地。但是朋友畢竟是朋友，兩人在文字上動點意氣，畢竟都是爲着國家，話說完也就算了，總不好針鋒相對地糾纏爭執到底，胡適在最新的文章中沒有繼續批駁丁文江，大半是出於這樣的考慮。胡適的文章寫於二月中旬。二月二十二日，丁文江在北平立遺囑，約請胡適和翁文灝作見證人㊼。這年年底，丁文江到湖南勘察煤礦，不幸因煤氣中毒病倒。臥病長沙期間，胡適、傅斯年、朱經農等人動員各處醫生治療，胡適因爲「一二九」學生運動留在北平處理學潮，無法抽身南下，但與長沙電報不斷，隨時了解情況的變化。次年一月五日，丁文江終告不治，胡適說他是「一個最可敬愛的朋友」，「一個最難得的天才學者」。另外在給周作人的信中，胡適也有一段眞誠的感念。他說：「在君兄之死，眞是一大損失。在君治學之外，實有辦事的天才，不像我們書生只能拿筆桿，不能做事」㊽。

胡適晚年替丁文江寫傳，提起當年的民主與獨裁之爭，用了不少力氣解釋他「最可敬愛的朋友」何以主張獨裁。他指出丁文江向來鼓吹「少數人的責任」，向來相信社會上只有少數人有「爲全體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心，所以對於市民政治總是沒有興趣。民國二十二年丁文江出國的時候，德國希忒拉剛剛登臺，蘇俄的第一個五年計畫剛剛結束，美國也正由國會把許多緊急時期的國家大權給羅斯福推行新政，所以不免受到影響，而主張「新式的獨裁」。不過丁文江並不是不知道獨裁的壞處。胡適引丁文江自己的話說：「同時我也不是迷信獨裁制的。在現代社會中實行獨裁的首領，責任太重大了，任何富於天才的人都很難稱職。何況這種制度的流弊太明顯了。要能永久獨裁，不但必須消滅政敵，而且要使政敵不能發生，所以一定要禁止一切的批評和討論。在這種制度之下，做首領的腐化或是盲化只是時間問題」。丁文江旣然知道這些獨裁的壞處，還是要主張「新式的獨裁」，按照

㊺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三二～三三；胡適，「丁在君這個人」，獨立評論，第一八八號（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頁九～一四。
㊻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一〇六。
㊼ 竹垚生，「丁文江先生之遺囑」，獨立評論，第二一一號（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頁一八～二〇；胡頌平，年譜，第四册，頁一三四六～一三四七。
㊽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一〇八～一二〇；適之，「編輯後記」，獨立評論，第一八五號（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十二日），頁一九；「胡適致周作人」（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九日），書信選，中册，頁二九六～三〇〇。胡適晚年在紐約的書齋裏，掛了一幀獨有的小像，就是丁文江的像。見陳之藩，在春風裏（臺北遠東圖書公司，民國七十二年），頁六二。

胡適的進一步解釋，那是因爲丁文江的愛國苦心，他的科學態度，他的細密思考，他相信做首領的能够得到許多大權，就能够把國內少數的聰明才智之士團結在一起，爲國家做統計設計的工作，這是他一九三三年從海外「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國家」得來的「現代政治趨向的風雨表」㊾。

胡適替丁文江寫傳的時候，丁文江已經去世二十年，其間許多新的發展，當然是丁文江身前沒有看到也沒想到的。所以胡適還有一段話說：「我們在二十年後評論他的『結論』，也應該回想在君到德國是在一九三三年希忒拉初登臺的時候，他到蘇俄是在一九三三年史太林還沒有走上兩三年後大瘋狂大屠殺的時期。他在那時候只看見希忒拉在短時期內打破了一切國際的束縛，把德國造成一個有力量可以抵禦外國侵陵的國家。他在那時候也只看見蘇俄的領袖不顧一切困難，不惜一切犧牲，只埋頭苦幹，要把一個落後的國家變成『世界第一個工業國』」㊿。這段話透露的意思很多。它幫助讀者理解丁文江，讓讀者知道丁文江愛國的情急，也讓讀者知道希忒拉和史太林獨裁的終歸失敗。這裏所牽涉的，已是胡適晚年在民主與獨裁之間所堅持的選擇，以後將作進一步的討論。

四、

胡適和丁文江的辯論結束了，但是他仍然密切注意各種政治意見，隨時重申他對民主憲政的主張。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因爲國民黨要召開六中全會，陳之邁和錢端升分別在獨立評論撰文，說明他們對政制改革和六中全會的期望。兩人都認爲政治有改革的必要，但是黨治不必取消，政權不必開放，因爲照錢端升的說法，在國難嚴重之中「維持黨政府的系統爲最方便的改良內政之道」，照陳之邁的說法，「目今也找不到一班人能組織一個政黨和那創造共和提倡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抗衡的，勉強開放黨禁只有重新開演民初黨派合縱連橫的怪劇」。然而在不開放黨禁的情況之下，如何才能達成政治改革呢？陳之邁的答案是由國民黨自行分派，各派互相監督，輪流執政，錢端升的答案是國民黨內各派應在最高領袖之下團結起來，這個領袖以蔣委員長最適宜，但蔣委員長雖做最高領袖，卻不宜做一個獨裁者，應做一個「不居名而有其實的最高領袖」51。針對陳、錢二人的文章，胡適就發表了一篇文

㊾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一〇二～一〇三。
㊿ 同上，頁九八
51 陳之邁，「政制改革的必要」以及錢端升，「對於六中全會的期望」，獨立評論，第一六二號（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四日），頁二～五，五～九。

長七、八千字的「改革政制的大路」。

談到最高領袖的問題，胡適同意中國當時需要一個偉大的領袖領導解救國難，但是他認爲這個領袖必須是一國的領袖，而不是一黨一派的領袖。「他自己儘可以繼續在黨內做一黨的領袖，正如他儘可站在軍中做一軍的領袖一樣。但他的眼光必須遠超出黨的利益之外，必須看到整個國家的利益。不能如此的，決不够資格做一國的領袖」。胡適相信蔣委員長確有做一國領袖的資格，因爲「他長進了，氣度變闊了，態度變和平了。他的見解也許有錯誤，他的措施也許有很不能滿人意的，但大家漸漸承認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爲一黨一派謀利益的。在這幾年之中，全國人心目中漸漸感覺到他一個人總在那裏埋頭苦幹，挺起肩膊來挑擔子，不辭勞苦，不避怨謗，並且『能相當的容納異己的要求，尊重異己者的看法』」。同時胡適認爲蔣委員長的最大缺點「在於他不能把自己的權限明白規定，在於他干涉到他職權以外的事。軍事之外，內政、外交、財政、教育、實業、交通、煙禁、衛生，中央的和各省的，都往往有他個人積極干預的痕跡。其實這不是獨裁，只是打雜；這不是總攬萬機，只是侵官」。分析了蔣委員長做領袖的優點和缺點之後，胡適希望蔣委員長認淸他的「官守」，明定他的權限，不可用軍事最高長官的命令來干預「官守」以外的政事，他應該像日本西園寺公一樣，自處於備政府諮詢的地位，協助政府作重大的決定，然後退藏於密，不再干預[52]。

胡適更關心的還是政治制度，也就是政權開放的問題。陳之邁和錢端升都說黨治不必取消，政權不必開放，應該先求國民黨內部的團結，陳的團結辦法是分派合作，錢的團結辦法是支持蔣委員長做最高領袖。胡適認爲陳、錢二人的方案雖然不同，但是他們所看到的都只是國民黨內的三、五個人，或者三、五個小組，都忽略了更廣大的全國人心。他說：「今日當前的問題，不是三五人的合作不合作，也不是三五個小組團結不團結。今日的眞問題是收拾全國的人心」。他又說：「能團結全國人心了，那三五人也不會永遠高蹈東海之濱的；若不能團結全國的人心，即使一兩個天下之大老扶杖來歸，也何補於政治的改革？何益於建國的大計」？然則政治改革的途徑何在？收拾人心的方法何在？胡適簡單的答覆是「今日收拾全國人心的方法，除了一致禦侮之外，莫如廢除黨治，公開政權，實行憲政」[53]。

在胡適的心目之中，憲政的好處是很多的。有人懷疑憲政實行時人民程度還够

---

[52] 胡適，「政制改革的大路」，獨立評論，第一六三號（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頁二～九。
[53] 同上。

不上做憲政之下的選民，胡適說最有效的政治訓練，就是讓人民親身參加政治，「學游泳的人必須先下水，學彈琴的人必須先有琴可彈。憲政是憲政的最好訓練」。他又說黨治制度不應該是孫中山先生的本意，國民黨原來不認爲一黨專政是永久的，黨治的目標是訓政，是訓練人民作憲政的準備。然而訓政訓了七、八年，民眾所得的訓練在那裏？在這個時候，大家是不是應該想想：絕少數的人把持政治權是永不會使人民得着現代政治的訓練的。有人懷疑實行憲政，開放政黨，將會重演民初政治的怪劇，胡適也不以爲然。他認爲從世界各國的發展看，從中國經過四年的國難看，都是國家意識增高，黨派意識降低，有遠識的政治家應該抓住這個大趨勢，公開建立「國家高於一切」的意識，造成全國家的超黨派的政治。他並且認爲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的精神就是「無黨政治」的精神。五權之中，司法、考試、監察都應該是無黨的，立法權沒有質問彈劾，也沒有任官的承認，只成了一種制定法律和修改法律的專門技術事業，因此也可以無黨，所剩的只有行政，然而一切事務官如果全用考試制度，行政權的絕大部份也可以不受黨派政爭的支配。所以他說：「如果將來的憲政能够逐漸實行『五權憲法』的精神，中國的憲政大可以不必重演政黨紛爭和分贓的老路」。除此以外，胡適認爲國民黨不必擔憂政黨開放會影響到他們的權力，而應重視其造成監督制衡的好處。他借陳之邁所謂找不到一班人組織政黨和國民黨對抗的話說，國民黨的政權很穩固，不怕新興的政黨起來奪取，但是政黨開放之後，因爲政權有被取代的可能，國民黨也許會幹的更高明。他說：「今日黨治的腐敗，大半是由於沒有合法的政敵的監督。樹立一個或多個競爭的政黨正是改良國民黨自身的最好方法」[54]。

由於胡適認定憲政有許多好處，所以在談到蔣委員長做最高領袖時，他特別希望蔣委員長用他的聲望和地位，毅然作憲法的主張，毅然擁護憲法草案，促成憲政的實行。他以強調的語氣說：「只有一個守護憲法的領袖是眞正不獨裁而可以得全國擁戴的最高領袖。那是政制改革的大路」。西安事變發生，胡適曾撰文痛斥張學良背叛國家，破壞統一，毀壞國家的民族力量，妨害國家民族的進步，同時指明蔣委員長是「關係全國安危的領袖」，是像傅斯年所說的無可比擬的重要。西安事變之後，蔣委員長個人的聲望達於頂點，擁戴之聲不絕於耳，胡適再發表文章，仍然期望蔣委員長努力做一個「憲政的中國」的領袖。他說：「因爲蔣介石先生個人的魄

[54] 同上。又見胡適，「從一黨到無黨的政治」，獨立評論，第一七一號（民二十四年十月六日），頁一〇～一二。胡適當時所了解的五權憲法之下立法院的權力，與行憲後立法院的權力顯有不同。

力與才能確是超越尋常，他的設施的一部分也逐漸呈現功效使人信服，所以國內逐漸養成了一種信任領袖的心理。最近半個多月中，全國人對他的安全的焦慮和對他的出險的歡欣慶祝，最可以表示這種信賴領袖的心理」。然後他筆鋒一轉繼續寫道：「但是那半個多月全國的焦慮也正可以證明現行政治制度太依賴領袖了，這決不是長久之計，也不是愛惜領袖的好法子。一切軍事計畫，政治方針，外交策略，都待決於一個人，甚至於瑣屑細目如新生活運動也都有人來則舉，人去則鬆懈的事實。這都不是為政之道」。批評了人治，胡適再談法治。他說：「憲法就是法治，而『徒法不能以自行』。憲政的成功需要法治習慣的養成，而法治習慣的養成必須有領袖人物以自身作則，隨時隨地把自己放在憲法之下，而不放在憲法之外」。他又說：「憲政的精神是情願造起法律來束縛自己，不但束縛自己不許作惡事，並且束縛自己不許在法定職權之外做好事。……我們希望蔣介石先生能明白他的地位重要，希望他無論在憲政之前或憲政之下都能用他的地位來做一個實行法治的國家領袖」㊺。於此可見，胡適基於民主憲政的理想，決不希望蔣委員長做事必躬親、充滿人治色彩的最高領袖。「做憲政的領袖」，「以領袖地位實行法治」，這是萬般擁戴聲中的空谷足音。

國民政府原定於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以求制訂憲法實行憲政，但因推舉候選人發生糾紛困難，所以又決定延期到第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由於要召開國民大會，討論民主憲政的文章仍然不斷。從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到盧溝橋事變發生，獨立評論又陸續刊登陳之邁、君衡、張溪山、張佛泉等人的文章，其中雖有一些技術性的爭論，但是大致都認定民主憲政隨時可行，實行之初，選擇也許局限於一些受教育的人，然後逐步推廣，達到最後普選的目標，讓人民在憲政的過程中不斷的學習民主憲政㊻。胡適綜合大家的意見，歸納為三點結論。第一、憲政不是什麼高不可攀的理想，是可以學得到的一種政治生活習慣。憲政不須人人「躬親政治」，也不必要人人都行使「創制、複決、罷免」各種政權。民主憲政不過是建立一種規則來做政治活動的範圍，政府與人民都必須遵守這個規定的範圍，在這個範圍之內，有能力的國民都可以參加政治。第二，憲政可以隨時隨地開

㊺ 胡適，「政制改革的大路」；「張學良的叛變」，大公報（天津），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新年的幾個期望」，大公報（天津），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三日。

㊻ 見獨立評論，第二三二號（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二日）至第二四〇號（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在這些文章中，張溪山不同意民主是幼稚園的政治，而認為是一種「最高等的政治制度」，但是他基本上贊成即刻實行民主憲政，「先由低度做起」。張佛泉最接近胡適的看法，所以胡適在張文之後「忍不住要寫一段尾巴」。見胡適，「再談談憲政」，獨立評論，第二三六號（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頁五～七。

始，但必須先從幼稚園下手，逐漸升學上去。憲政的學習方法就是實行憲政，民治的訓練就是實行民治，不妨先選定一種易知易行的代議制下手。第三、現在需要的憲法是一種易知易行而且字字句句都可實行的憲法。如果根本大法的條文就不能實行，就不能遵守，那就不能期望人民尊重法律，也就不能訓練人民養成守法的習慣。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公佈的憲草，大概可以成為一個字字句句可以實行的國家根本大法，可以做憲政的開始了㊼。這些結論發表的時候，已經是七月十一日，盧溝橋的槍聲已響，抗戰已告全面爆發。隨後獨立評論停刊，胡適和他的一班朋友要求立即實行民主憲政的主張，也就暫告擱置，無暇再談下去了。

五、

日本侵華戰爭發動於九一八，七七事變則是這次侵華戰爭的全面擴大。胡適自始至終，認定日本侵華是軍閥獨裁之下的產物，抨擊不遺餘力，引起國內國外的廣泛注意。但在九一八到七七事變的幾年之中，胡適還希望日本的文治憲政勢力可以抬頭，把軍閥力量壓抑下去，使中日的全面大戰可以避免。等到戰爭終於不可避免，他又奉派到美國去辦戰時外交，他對中日戰爭以及隨後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便一再強調說是民主對抗極權的衝突。

胡適對於日本原無深入研究。民國十六年四月他遊歷歐美之後坐船到橫濱，丁文江曾派人帶信給他，勸他暫留日本勿歸，以免受國內黨爭的困擾，同時借機會研究日本國情，因為中國存亡安危的關鍵在於日本。可惜胡適不懂日本話，又感覺在日本的費用太大，不久便從日本回國，失去一次研究的機會。丁文江本人當時在大連閒住，沒有什麼事情可忙，倒是對日本的國情下了一番功夫㊽。九一八以後，胡適、丁文江和一班朋友創辦獨立評論，丁文江最初寫的幾篇文章，分析日本的政局，很得到胡適的呼應贊同。按照胡適和丁文江的看法，九一八事變以及第二年五月日本首相犬養毅的被刺，都代表日本軍閥勢力的崛起以及政黨議會能力的衰退，中國既無力全面抵抗日本，便應該儘早與日本交涉，尋求和平解決，承認日本合法利益。如果老是一味推諉延宕，既不表示態度，又不進行交涉，則恐事端迭起，造成口實，更促進日本軍閥的法西斯運動㊾。這種偏向談判妥協的想法，很引起傅斯

㊼ 胡適，「我們能行的憲政與憲法」，獨立評論，第二四二號（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頁一二～一三。

㊽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八二，八六。

㊾ 丁文江，「犬養被刺與日本政局的前途」，獨立評論，第一號（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頁三～五，以及「日本的新內閣」，獨立評論，第二號（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頁二～三。胡適，「論對日外交方針」，獨立評論，第五號（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頁二～五。

年的憤慨。傅斯年認定中日問題「決無和平解決之望」，希望與日本和平解決者「直是做夢」，「理性的先生們」所謂日本的行爲只是軍閥的行爲，並非日本國民如此，「這是全無意義的話」。他進一步質問說：「一個民族之行爲，全以其如何組織而定，現在日本軍閥既統治了日本，而日本之行爲由其軍閥指揮之，則日本軍閥之行爲即日本民族之行爲，……日本人既不能站起來以糾正其軍閥，而反跳起來喊著向滿蒙去，則日本今日之狂謬絕倫之舉動，焉能用『日本軍閥』一句話把日本人開脫出去」⑩？

民國廿二年春天，日本不理會國際聯盟的調解，又進兵佔領熱河，並退出國際聯盟組織，中日問題談判解決的希望，顯然已經破滅。胡適一度也放棄和解的主張。他引述國際聯盟的李頓報告書，引述美國的不承認主義，指出國際都不承認日本在中國內部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面、條約和協定，中國在恢復東三省和熱河的領土主權之外，也決不能和日本交涉，把失地簽讓給敵人。他說：「我們也許還要受更大更慘的侵略，但我們此時已被『逼上梁山』，已是義無反顧的了」⑪。雖然如此，他以後觀察中日問題，主要思考之一仍是日本軍閥獨裁與文治憲政的矛盾，他偶然還要主張妥協保全，除了其他的考慮之外，也是著眼於這一矛盾。

舉例說吧。熱河失陷以後，湯爾和在獨立評論翻譯了一篇東京同仁雜誌上的日本人談話，其中L氏答覆K氏的問題說，中日問題「也不是沒有法子，要之，日本人停止侵略中國就行」。胡適看到這篇談話，顯然感到興奮，馬上寫了一篇「日本人應該醒醒了！」他在這篇短文中表示L氏的談話居然可以在日本出版，「居然能在軍閥氣燄最高張的時候在東京出版，這不能不說是日本心理轉變的一個起點」。他斷言L氏「大概代表日本自由主義者（Liberals）」，他們雖然還不敢提出具體的主張，但是顯然已在公然提倡「披瀝胸襟、互相研究」一種有「覺悟」的「國策」。他又說：「日本軍閥在中國的暴行所造成的仇恨到今天已很難消除的了。但這一個仇恨最烈最深的時候，也許，正是心理轉變最容易的時候，九世之仇，百年之友，都在這一點覺悟與不覺悟的關頭上」。⑫

民國二十二年夏天，天津情勢一度危急，一部份人主張犧牲平津，犧牲華北，

---

⑩ 傅斯年，「日寇與熱河平津」，獨立評論，第十三號（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頁七～一〇。
⑪ 胡適，「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獨立評論，第四十四號（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二日），頁二～五。
⑫ 胡適，「日本應該醒醒了！」以及爾和，「介紹一篇日本人的談話」，獨立評論，第四十二號（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頁二～六。

步步抵抗，決不作任何局部的妥協，雖有絕大的糜爛，亦所不恤。㉝胡適和另外一些人則主張暫時謀局部的華北停戰， 先保全華北。 他舉出主張保全華北的三點理由：一是爲國家減輕損失；二是平津華北有重要富源，是中國已成鐵路集中地區，有全國關稅收入第二位的天津港口， 以及整個北方文化中心的北平， 不可輕言犧牲；三是歐美各國正在應付經濟問題、軍縮問題和歐洲和平問題，無法東顧，若華北不保，戰事擴大，並不會引起世界的注意和國際的干預。然後他特別強調說：「軍事做到一個段落即是使敵人的暴力暫時無用武之地。暴力無用武之地，然後敵人國內的和平勢力可以抬頭，而國外國際的正誼制裁也可以有從容施展的機會。戰事延長，局勢擴大，則（日本）軍人勢力可以無限的伸張，國中的輿論決不敢與軍人背馳，而一切國際制裁也決不能發生絲毫的效力」㉞。

胡適不僅在國內發表上述一類的看法，有時也借著日本新聞界的要求，向日本讀者提出同樣的見解。譬如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他接受日本新聞聯合社記者山上正義的訪問，談到中日關係的障礙，談到廣田外交，他感嘆日本外交家對於軍部的主張沒有根本的挽救，只是對軍部彌補過失，同時他明白的表示：「我們當然希望日本的文治派能大有作爲，矯正軍部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危機」。㉟同年十一月他接受日本評論室伏高信的要求，撰寫「敬告日本國民」。在這篇文章裏，他向日本國民說了三句話，表示了四點擔憂。三句話是誠摯的懇求日本國民不要再談「中日親善」，「請日本國民不要輕視一個四億人口的民族的仇視心理」，以及「日本國民不可不珍重愛惜自己的過去的偉大成績和未來的偉大前途」。四點擔憂主要是擔憂日本的政治趨向，依次是：第一，日本六十年來政治上很明顯的民治憲政的趨勢，在短時期中被截斷了，變成了一種武人專政的政治；第二，日本原是一個以紀律秩序著名的國家，在幾年之中，顯出了紀律崩壞的現象，往往使外國人不知道日本的政權究竟何在，軍權究竟何在；第三，日本由一個應該最可愛羨的國家變成了最恐怖的國

㉝ 傅斯年說過：「平津擾亂，比起東北失地來，實在是一件小事。天津至多不過是個上海，上海既可犧牲，何以天津不可以？至於北平，有些斯文先生們，以所謂文化事業與國寶爲慮。然而國寶也者，在太平盛世果然是寶，在這年頭兒，直是石獃子的扇子，亂時能拿着走，彷彿像『抱着祭器而去之』，固然很好，……若不得不蒙損失，則亦只好付之無可奈何，比起東北失地來，眞不值得甚麼」。他又說：「所謂投鼠忌器之談，第一須所投者爲鼠，今則是虎，第二須持之以投者爲器，今則是破瓦釜而已。爲中華民國整個前途計，北平的存毀是不値半秒鐘猶移的」。同註㉚。

㉞ 胡適，「保全華北的重要」，獨立評論，第五十二、五十三號（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四日），頁二～六。

㉟ 胡適，「中日提携，答客問」獨立評論，第一四三號（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頁二～三。民國二十三、二十四年，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倡中日提携之說，由日本給予中國各種援助，但是中國必須嚴禁反日運動，並不接受其他國家之援助。這就是所謂廣田外交。

家，在偌大的世界裏只有敵人，而無友國；第四，日本以武力造成的國際新局勢，只能用更大的武力去維持，因而必須無限制的擴充軍備，而無限制的軍備擴充將更增加國際的疑忌和軍備的競賽，進而引起國際的大戰禍。這篇文章讚美日本民治憲政，批評日本軍人專政之害，可說十分露骨，經過一小部份的刪改，在日本評論刊出，據說在日本知識份子中「引起很大的感動」，他們對胡適「發生了異常的稱讚」。室伏高信則寫信給胡適說：「我想請各位用稍微遠大的眼光，靜觀中日兩國關係。日本並不是長此繼續錯誤的國民，且日本國民也不是永久盲從的國民」。㊱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東京發生兵變，包括岡田首相在內，許多內閣大臣都受到日本第一師團第三步隊青年將校與士兵的攻擊，或者殞命，或者受傷，日本軍人的專橫至此暴露無遺。四天以後，兵變敉平了，日本政府得以重新控制局勢，因此胡適又寫文章，引用中國「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的哲言，告訴日本人「不受制裁的武力和迷信侵略的軍人政治都足以引起鄰國疑忌，都足以引導一個國家走上『自焚』的路」。他盼望日本國民能覺悟這次兵變的教訓。他說：「此次變亂若能使日本全國人民覺悟軍人政治的危險，若能使軍人法西斯運動的聲望與信用都低落下去，若把整個民族從軍人萬能的迷夢裏拯救出來，上下一致的努力回到文治和憲治的軌道上去，——若能如此，豈但日本可免『自焚』之禍，我們做鄰居的人也都可以減輕一點『城門失火，殃及魚池』的恐懼了」！㊲這一段話，是抗戰全面爆發以前胡適最後的大聲疾呼，希望日本人民覺悟軍人獨裁的危險，希望日本回到文治憲政的道路。

六、

但是，日本文治憲政的力量未能回頭，軍人獨裁終於導致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盧溝橋事變之後，胡適奉派前往美國辦理外交，先任特使，更於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受命擔任大使，一直到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卸職，在這段外交生涯中，隨著國際情勢的惡化，他的言論訴求和早幾年又不相同。

㊱ 胡適，「敬告日本國民」，獨立評論，第一七八號（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頁一〇～一四；胡適，「答室伏高信先生」，以及室伏高信，「答胡適之書」，獨立評論，第一八〇號（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八日），頁五～一二；室伏高信，「再答胡適之書」，獨立評論，第一九二號（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頁一五～一九。室伏高信當時在日本言論界主張反戰，珍珠港事變之後被迫離開日本評論，停止一切文化活動，避到鄉下去過了幾年貧苦的生活，戰後才再回到東京辦雜誌，寫評論。他的女兒室伏ケララ於一九四〇年以日本評論特派員身份到上海、南京工作，戰後受僱於我國中央宣傳部，做對日文化工作。見「室伏ケララ致胡適」（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十日）書信選，下册，頁一一四～一一六。

㊲ 胡適，「東京的兵變」，獨立評論（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八日），頁二～五。

胡適早已指出日本在遠東太平洋原來尙能維持霸權，但是它一步步的侵華行動，促使美國和國際聯盟合作，美國和蘇俄建交，蘇俄調集大軍到遠東，以及英、美兩國在遠東增強海軍，所有這些對抗力量，加上中國在國難中陶煉出的民族統一，使太平洋出現國際新均勢，日本的霸權漸趨沒落。不過那時全面抗戰尙未爆發，所以他在談到各國對抗日本形勢發展的同時，還是希望日本有所覺悟，能够了解新的形勢，與各國合作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機構，和平解決太平洋與全世界的各種問題。⑱等到他去美國辦理戰時外交，他對日本的期望是澈底的破滅了，認爲各國對日本的黷武主義不應再採消極的綏靖主義，而應改採一套積極的建設性的和平政策。他到美國之後第一次發表廣播演說，就特別表示中國並不希望美國捲入戰爭，但是美國單靠綏靖主義和中立政策，並不能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禍，也不容易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禍，美國應該以實際積極的態度，與世界上民主國家合作策劃，阻止戰爭，遏制侵略，促成集體安全。他又說，美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力求避免戰爭，結果與聯軍並肩作戰，以作戰來終止戰爭，「使世界得以確保享有民主體制」。在新的危機中，美國人也熱切地努力使美國不捲入戰爭，但是不久可能也會以同樣的熱切努力，以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再一次以戰爭來終止戰爭，「又一次的使世界得以確保享有民主體制」。⑲所以，在戰爭沒有全面爆發之前，胡適希望日本文治憲政的力量抑制軍閥獨裁，也希望日本能與各國合作維持和平，戰爭全面爆發之後，胡適轉而希望美國領導民主國家，制止黷武主義的侵略。

然而那些是民主國家？那些是黷武主義的侵略國家？在胡適的心目之中，未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敵對陣營如何劃分？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美國外交政策協會在紐約舉辦一場討論會，邀中日雙方辯論「遠東衝突背後的問題」，胡適代表中國發表意見，他說這次衝突之後只有兩個問題，第一是日本帝國主義以及日本在亞洲的野心和中國民族主義的衝突，其次是日本軍國主義和世界新秩序的道德約束衝突。在談到第二個問題時，他有所引伸的指出世界新秩序的道德約束是維護國際和

⑱ 胡適，「世界新形勢裏的中國外交方針」，獨立評論，第七十八號（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頁二～五；Hu Shih,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Forces in the Pacific," *Foreign Affairs*, Vol. 15, No. 2 (January 1937), pp. 254-259; 胡適，「日本霸權的衰弱與太平洋的國際新形勢」獨立評論，第二三四號（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十八日），頁二～八；以及胡適，「倫敦的英日談判」，獨立評論，第二三五號（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頁二～三。

⑲ Hu Shih, "What China Expects of America in the Present Crisis," *The Far Eastern Magazine*, Vol. 1, No. 1 (November 1937), pp. 14-16. 譯文見年譜，第五册，頁一六一七～一六二〇。這篇演講的內容，舊金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原來覺得太利害，希望胡適修改，但是胡適寧可取消，不願修改，結果便照原文播出。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的日記（香港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頁五九一～五九二。

平、法律和秩序，但是德國、意大利、日本三個國家，過去曾依據「沒有」的國家有權侵略和掠奪「有」的國家的理論，先後展開帝國主義的爭奪，攫取各處殖民地，最近又紛紛破壞國際聯盟和巴黎非戰公約，不僅使中國一樣的弱國受到傷害，就是英國、美國、蘇俄等強國也受到逼迫，英國建立新加坡海軍基地，美國擴充海軍軍備，蘇俄調大軍守衛遠東，都是因爲受到逼迫而採取防禦措施的明證。⑩ 在這段談話之中，胡適把德、意、日劃歸一個陣營，把中、美、英、蘇劃歸另一陣營，意思至爲明顯。國際情勢的實際發展當時還不十分清楚。中日戰爭雖已全面爆發，但是中國和德國、意大利仍有外交關係，一方面想尋求兩國的軍事援助，一方面也讓德國從中調解試圖達成停戰，至於德國進攻波蘭，德、意、日、三國結爲軸心同盟，日本偷襲珍珠港，都還是兩年、三年、乃至四年以後的事。

等到德國進攻波蘭，歐戰爆發，中國處境更加困難，胡適心目中的民主國家能否一方面對付德國在歐洲的攻擊，一方面以其餘力支持遠在亞洲的中國，顯然是一個重大的疑問。但是胡適信念十足，他強調中國抗戰的立場是純正的，日本的侵略是可憎的，民主國家總會儘量給予中國援助。他談到美國進出口銀行給中國的貸款，談到美國政府通知日本政府廢除美日商約，他說「這些美國政府的行動使我們疑惑的陰影煙消雲散，民心大振」。他認爲英、法幫助中國，不是爲了急於防禦日本對它們遠東利益的威脅，而是出於對中國的深切同情，因爲「目前這些民主國家正實際從事一連串反抗侵略和逼害人民的戰爭」。他又說：「最近英、法稍爲削減駐華北的軍隊，可能歐洲局勢之突變會逼迫英、法在亞洲大陸對日本作其他小讓步，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爲反抗征服世界的武力而戰的民主國家，確實不會背叛兩年前至今一直爲抵抗侵略而戰的中國」。甚至談到蘇俄，胡適雖說「蘇俄在遠東會有何作爲是誰都無法知道的」，但是他又說他看不出有何跡象表示蘇俄已經或者將會放棄援華」。⑪ 總而言之，民主國家必與中國並肩作戰，這一點胡適深信不疑。

或者有人以爲胡適在美國公開講話，強調中、美、英、法、蘇的共同利益與共同陣線，強調民主與侵略的分野，實際效果仍然不彰，中國應該儘速爭取的，厥爲

---

⑩ 年譜，第五册，頁一六二〇～一六二四。兩年以後，也就是德國進兵波蘭引起歐洲大戰之後，胡適在紐約華爾道夫飯店對美國中國協會發表演講，內容大致相同。見 Hu Shih, "Fundamental Issues of the Far Eastern Conflict,"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5, No. 1 (Winter 1939), pp. 65-70.

⑪ Hu Shih,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hina", *China Monthly*, Vol. 1, No. 2 (January 1940), pp. 4-5, 12-13. 譯文見年譜，第五册，頁一六九〇～一六九六。

金錢與物質的支援。行政院院長孔祥熙曾有電報指示胡適說：「空言道義同情，無補時艱。究竟美方是否澈底明白太平洋與彼利害，贊同我國繼續抗戰，並予我以實際上援助，庶我得以支持。現事態嚴重，不容稍緩，務請日內設法謁美總統，痛陳一切，請其當機立斷，予我以明確表示，俾我參酌」。但是胡適顯然認爲最重要的還在中國站穩立場，表現一種精神氣節。德、意、日三國軸心關係正式建立之後，他給政府的電報就說：「今日世界大勢已極分明，德國攻英已告失敗，德意與暴日結爲同盟，英美密切合作已無可疑，羅斯福總統連任似無可疑。當此時機，我國對於國際分野似宜有個較明顯的表示。例如德意現與暴日結盟，既承認其『東亞新秩序』，則皆是我仇敵。我國似應召回德、意之使節，使國人與世人知我重氣節、有決心，似是精神動員之最有效方法」。㊷

民國三十年夏天，德國軍隊進攻蘇俄，我國外交部也宣佈對德、意絕交，儘管珍珠港事變尙未爆發，美國尙未捲入戰爭，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兩個陣營的劃分已經完全明朗。胡適於七月八日到密西根大學演講，毫不隱諱的大談「民主與極權的衝突」，隨後並將這篇演講發表於美國政治社會學會年刊（*The An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這篇演講是從湯普蓀女士（Dorothy Thompson）的一篇專欄文章說起。湯普蓀認爲德蘇戰爭會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後果，蘇俄紅軍已不是爲世界共產主義而戰，而是爲保衞祖國而戰，其意識形態可能是民族主義的和俄國的，經過一場大戰之後，有三種意識形態可能被消滅，即就是共產主義、納粹主義以及保守主義。湯普蓀把各種意識形態都看成「赤裸裸的騙人謊言」，她認爲美國在各種意識形態的衝突中，應該保持超然，訴諸理性，以「龐大的宣傳運動」，以「每天二十四小時」向全球廣播，說明「美國的和平大方向」。胡適不能同意湯普蓀對意識形態的解釋和分類。他提出疑問說：如果保守主義是意識形態，自由主義是甚麼？如果蘇俄紅軍放棄世界革命，改採民族主義的俄國的意識形態，何以認爲後者就不會是「赤裸裸的騙人謊言」？以「每天二十四小時」的「龐大宣傳運動」說明「美國的和平大方向」，豈能說「不是」意識形態的宣傳？他要求美國人弄淸楚，意識形態無所謂好與壞，新的戰爭是一場意識形態的衝突，但它不是甚麼左與右，或者共產主義對抗法西斯和納粹主義的衝突，而是

㊷ 「孔祥熙致胡適電」（一九三九年九月六日），「胡適致陳布雷並轉蔣介石、孔祥熙等電」（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二日），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往來電稿（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八年，以下簡稱電稿），頁二四，七三～七五。德、意、日三國在柏林簽訂同盟條約，建立軸心關係，事在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民主與極權的衝突，是所有極權國家在責辱、攻擊、毀滅他們的共同敵人，也就是民主的思想、理念、行爲和制度。⑬這等於是告訴美國人說，美國不要以爲可以輕易的擺脫於意識形態的衝突之外，不要以爲可以擺脫於新的戰爭之外，作爲主要民主國家之一的美國，必須勇於接受極權的挑戰。

胡適進而對民主和極權兩種意識形態，作了詳細的說明和分析。他說，憲法的、議會的、民主的政府形式經過早期的熱烈爭論之後早已定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勝利，全球可望安於民主之際，一場世界性的革命突然爆發，試圖建立無產階級的獨裁，推翻資產階級的議會和民主。從此以後大約二十年的時間，反民主的運動即在各處蔓延，無論是國際共產主義，或者是國家主義的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儘管他們彼此有所不同，但是他們都要攻擊民主的思想和理念，都採用極權獨裁的政治制度。胡適引用尹斯曼（Max Eastman）的一篇文章，列舉極權主義共有的特質二十一點，其中包括：達於宗教狂熱的國家主義情緒；以軍隊般訓練的獨一政黨掌握國家權力；嚴厲取締反對意見；使超自然的宗教隸屬於國家主義的宗教；領袖要全體效忠成爲實際上的神；鼓勵愚昧嚴懲誠實；焚毀書刊曲解科學歷史眞象；廢棄超然的科學與眞誠的學術（以上三點均爲反智作爲）；政黨國家控制言論，只有教條，不容辯論；讓人民陷於文化孤立，不欲他們知道外界的眞象；政黨控制創造性的藝術；政治謊言與政府僞善；國家計劃的犯罪（以上兩點代表道德的漠視）；鼓勵人民迫害拷問所謂的公敵；對所謂公敵的犯罪採用野蠻的家族部落連坐處分；準備持久戰爭，實施全民軍事訓練；不計後果的鼓勵人口增加；歧視婦女；濫用勞動階級反資本主義的詞彙；禁止勞工罷工抗議；破壞勞工運動；以及農工商業悉由政黨和領袖控制。除此以外，胡適在這篇演講中並以過半的篇幅，說明民主與極權的兩點基本差異：第一是民主採用漸進的，一點一滴的改革方法，極權採用激進的和毀滅性的革命手段；其次是民主承認個人的差異，容許個人的自由發展，極權要求全體一致，所有個人都要聽命於領袖、政黨和國家。⑭

胡適一方面比較民主與極權的意識形態，一方面更處處以美國作實際的範例。譬如談到民主的漸進改革，他特別引用詹姆斯（William James）、杜威（John

---

⑬ Hu Shih, "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 *The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218 (November 1941), pp. 26-36. 中文題目譯作「民主與極權的衝突」。部份譯文見胡適，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臺北自由中國社，民國四十六年三版），頁四三～五五。本文所用文字，針對該譯文與原文有出入處，作了若干修改。

⑭ 同上。

Dewey）和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論點。談到個人的自由發展，他就提到近代美國經濟的各種分殊的組織。他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在極權的攻擊之下，民主國家普遍缺少防備，但是美國已有明白的覺醒。他引述了羅斯福三任總統的就職演說，以及稍早在俄亥俄德吞市（Dayton）的演講。羅斯福不同意民主沒落，獨裁極權方興未艾的說法，他說：「過去八年的」民主經驗對於我們現在和未來的關係至爲重大，此一民主經驗成功地度過了國內的危機，消除了許多禍患，在持久的方向上建立了新的結構，同時透過此一經驗，民主得以維持其爲民主的事實。……我們知道民主，因爲在一切政府形式中，只有民主可以運用人類開明意志的全部力量。我們知道民主，因爲只有民主造成一種無限的文明，能够在人類生活的改善中達到無窮的進步」。羅斯福又說：「（外國的）宣傳一再重覆地說民主是一種沒落的政府形式。他們告訴我們，說我們舊有的民主理想和我們人民自由權利的舊有傳統，都是歷來的陳蹟。我們反對那種想法。我們說我們才是未來。我們說他們引導我們的方向，才會退回到古埃及王的桎梏，才會退回到中世紀的奴役」。胡適整段引述羅斯福的話，然後作結論說：「這些談話說明了衝突，接受了挑戰，也是在參加戰鬪。那是民主與暴政的衝突，是自由與奴役的衝突，是憲政法治與專制獨裁的衝突，是人們開明意志的自由表達，與盲目無條件的服從黨與『領袖』的衝突」。⑮ 胡適推崇美國，大量引述羅斯福的話，而且提出斬釘截鐵的結論，用意至爲明顯，就是要美國在對抗獨裁的戰爭中，再做一次民主國家的領袖。

胡適在美國人之前既然把新的國際衝突看作民主與獨裁兩個陣營的對抗，同時把中國歸於民主，把日本歸於極權，當然要向美國人說明中國所以民主，以及日本所以極權。早在抗戰全面爆發以前，胡適曾經比較研究中日兩國對於西化的反應，他當時的著眼點毋寧在於日本之得與中國之失。他認爲日本成功的原因有三：一是日本有一個強有力的統治階層，在西化和改革的各種運動中扮演領袖角色；二是日本統治階層同時是一批訓練有素的軍人武士，這些人在西化過程中的船堅礮利階段幫助日本迅速建立新的武力，使日本得以對抗外來的侵略；第三是日本上千年的政治發展，使得日本皇室維持淸明，可以在十九世紀中葉順利取代幕府將軍和封建貴族，仿照歐洲各國建立新的君主立憲政體，成爲改革運動的中心，不虞有政治動亂與革命戰爭。總而言之，日本的西化改革，是在一種相當能够控制的情況之下發展。反觀中國，三方面的情形正好和日本相反。在改革的企圖方面，由於西方力量的侵入

⑮ 同上。

正值滿清後期，滿清的貴族與軍人已經腐化無能，部份漢人知識份子縱有改革思想，卻無政治上的影響力。在船堅礮利的工作方面，中國因爲長期的帝國統一和儒道兩家的影響，愛好和平有餘，尙武精神不足，所以緩慢拖沓，未能儘快「建立對抗外來攻擊的力量。在政治領導方面，清末更是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從太平天國到辛亥革命，滿清皇室終被推翻，新的統一安定遲遲不能出現。凡此種種，都造成中國在西化反應中的失敗」。⑯這是胡適最早比較中日兩國西化所得的結論。從此以後，他一直在思考兩國現代化的問題，而且試圖從中尋求兩國戰爭衝突的原因。

胡適逐漸發現，日本經過七十年的現代化之後，其國民生活的基本方向並沒有改變，中國經過一世紀的猶豫和抗拒之後，物質方面的進步仍然不够，但在人生觀和人生意識方面卻有相當的現代化。抗戰爆發以後，他初到美國辦理外交，就說明了他對中日兩國現代化的新看法。他說日本的軍國主義階級幫助了日本的現代化，特別幫助了日本軍事改革的成功，但是這些封建軍人並不開明，他們對於新文化的了解有限，對未來的遠景展望不足，過度的使用現代化的一點軍事成就去保護日本古老的文化傳統，結果對於日本人民的控制非常嚴密，限制了文化的改變發展。同時在他們保護的傳統文化之中，雖有一些美好永恒的事物，但也有些部份非常原始，而且「含孕著火山爆發性的危險」。中國現代化的過程迴然不同。當日本封建軍國主義階級領導現代化迅速獲得初步成功的時候，中國卻需花費時間精力推翻專制皇帝，先做政治革命工作。但在政治革命過程之中，隨著政治權威的崩潰，中國得以發展自由接觸、自由批判、自由評價、自由主張和志願接受的精神。然後胡適舉出梁啟超、蔡元培、吳敬恒、陳獨秀等人做例子，指出他們都懂得以批評的眼光來瞭解中國的傳統，勇敢無情的揭露中國的弱點，這種勇於批評和無畏刑責的態度和精神，就使「中國的現代化已經超過日本」。最後胡適下結論說，凡是兩種文化相接觸之後，人民自然的傾向是向對方學習自己所缺少的東西，如果這種自由被剝奪了，整個文化陷於孤立和被保護，就會缺少辯證與活力，現在的日本就是這樣的情形。他說，自由的因素已經打破中國的傳統，有一天也會打破日本古老的習俗。⑰

珍珠港事變之後，美國正式加入戰爭，胡適更從中日兩國長期的歷史文化發

⑯ Hu Shih, "Types of Cultural Respons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7, No. 4 (January 1934), pp. 529-552.

⑰ Hu Shih,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A Comparative Study in Conflict," in Ruth Nanda Anthen (ed.), *Freedom: Its Meaning*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40), pp. 114-122. 譯文見年譜，第五册，頁一六九六～一七〇二。

展，向美國人說明戰爭的意義。他看日本的歷史，認爲日本在政治組織上，一直是極權統治，在學術上，一直是屈從傳統和權威，在教育上，一直是軍國主義的訓練，這樣的傳統，使日本從中古時代的英雄豐臣秀吉開始，就是一貫的採取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要向亞洲大陸擴張，進而要征服世界。談到中國傳統，他以「無爲而治」的黃老思想，說明中國人不喜歡政治權威的泛濫，以墨子的「兼愛」、「非攻」，說明中國人之愛好和平，以「有敎無類」的觀念，說明中國社會之不重視階級，以中國的諫奏傳統，說明中國有言論自由，以「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一類孟子的說法，表示中國人有民主革命的思想，以「不患寡而患不均」，表示中國有平均分配財富的理想。除此以外，他還談到長子繼承制度的廢除，科舉制度的發展，以及「學而不思則殆，思而不學則罔」等獨立思考和懷疑精神的傳統。總而言之，中國歷史文化所表現的是一種自由、民主、和平生活方式的發展過程。這樣比較之後，胡適告訴美國人說，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背景，產生兩種根本對立的生活方式，「中國人民自由、民主、和平的方式，目前正危險地遭遇著日本極權、壓迫、軍國主義方式的威脅」。⑱

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胡適在同一篇演講中，起始便開宗明義，指出中國抗戰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意義。他對美國聽眾說：「你們知道爲何而戰。你們是爲保衛民主的生活方式而戰，根據我的了解，那也就是爲保衛自由和平的生活方式而戰。就西方世界與西方文明而言，問題所在的關鍵，就是專制與民主的對壘，也就是自由對壓迫，和平對武力征服的鬪爭。目前太平洋地區問題的關鍵，和你們在西方世界所面臨者完全相同，也是民主生活方式對抗極權生活方式，自由與和平對抗壓迫與侵略的問題。正如西方問題的焦點在於納粹德國與西歐英美民主國家的衝突，太平洋問題的所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本和中國的衝突。中日兩國的衝突，基本上就是自由和平反抗專制壓迫，反抗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侵略的衝突」。⑲以後胡適在美國各地演講，也一再宣揚這一類的觀念。

七、

抗戰初起，國民政府爲團結禦侮，即接納共黨輸誠，並設立國民參政會，設若

⑱ Hu Shih, "China, Too, Is Fighting to Defend a Way of Life," (San Francisco: The Grabhorn Press, 1942). 胡適紀念館發行有中英文對照專刋，中文題目作「中國抗戰也是要保衞一種文化方式」。

⑲ 同上。

一切發展順利，中國未始不可於戰後走上政黨政治、議會政治的道路。然而隨著戰事的進行，正當胡適在美國宣揚中國也是爲民主而戰的時候，民國三十年發生新四軍事件，⑩國共合作關係開始惡化，並發展爲戰後的全面衝突與大陸的變色。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西方民主國家和蘇俄的關係之中。德國進攻蘇俄之後，美國傾全力援助蘇俄，雙方的合作原望有助於戰後的和平。不幸因爲第二戰場開闢的一再拖延，使雙方的嫌隙漸生，戰後蘇俄勢力坐大，先在東歐放下鐵幕，進而更對民主國家造成普遍的威脅。

胡適根本反對共黨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但是基於容忍的態度以及相信別人有嘗試的自由，對共黨一直相當包容。共產黨在中國初成立時，創辦人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是胡適的朋友，胡適曾勸他們「多談問題，少談主義」，做一點一滴的改造工作，不搞「快意一時震動百世」的革命，努力走向民主主義的目標，不必牽涉國際帝國主義問題。⑪民國十四年胡適致函陳獨秀討論言論自由，其中有一段話說：「我也知道你們主張一階級專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討論自由，也許爲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這一點在我要算一個根本的信仰。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爲老朋友者，正因爲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至少我可以說，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認別人有嘗試的自由。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你說是嗎」？⑫

民國十五年胡適到歐洲旅遊，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天，參觀了革命博物館，參觀了監獄，很受感動，覺得蘇俄人是「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意志的專篤（Seriousness of purpose），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這樣讚美蘇俄共黨的努力，頗使他的朋友徐志摩、錢端升等人不解，但是他說：「去年許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討論，我所以遲疑甚久，始終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實驗主義不容我否認這種試驗的正當，更不容我以耳代目，附和傳統的見解和狹窄的成見。我這回不能久住俄國，不能細細觀察調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見已足使我心悅誠服地承認這是一個有理

⑩ 新四軍爲抗戰開始後國民政府改編之部份共軍，主要活動地區在長江下游，兵力由最初之一萬人擴充至十萬餘人，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蔣委員長下令新四軍開往長江以北，再開往黃河以北，新四軍拒不受命，政府軍顧祝同部卽於次年一月初在安徽南部涇縣予以包圍繳械，葉挺被俘，項英被殺。此卽「新四軍事件」，導至國共戰時合作關係的惡化。

⑪ 張忠棟，「胡適從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論」。

⑫ 書信選，上册，頁三五八～三六〇。

想、有計畫、有方法的大政治試驗。我們的朋友們，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與制度的朋友們，至少應該承認蘇俄有這種試驗的權利」。[83]

訪問蘇俄之後，胡適經西歐到美國，發現美國人人可以做有產階級，工人代表能够站在大庭廣眾中歌頌時代的美好，階級戰爭的煽動不發生效力，馬克斯派的經濟學說和社會革命說，在美國社會根本不能適用。[84]他從美國坐船回國，在東京聽到外國人批評清黨反共有吳敬恒、蔡元培等人支持，這些人的見識人格，是他所佩服的。[85]除此以外，他對國內的共黨問題一直保持緘默。國民黨從容共、淸共到民國二十幾年剿共，中間的是非很多，他都沒有表示意見。他和朋友們辦獨立評論那幾年，政府幾次大軍剿共，其重要性並不亞於抗日問題，蔣廷黻有文章談共黨，丁文江有文章談共黨，他除了在民主與獨裁的辯論中把蘇俄當作新式獨裁專制的一個例子，對共黨問題幾乎完全避而不談。

女作家蘇雪林於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有一長信給胡適，細數左派對文化宣傳的操縱，以及魯迅死後在共黨利用下的遺害流毒，頗怪獨立評論態度過於和平，持論過於穩健，色彩不够鮮明。她認為獨立評論應該明朗積極，多登慷慨激昂，有光有熱的文字，打破青年迷信共產主義和蘇俄的大夢。胡適回信，說左派控制新文化不足為憂，左傾的思想文學不足為害，政府若能健全組織，加大力量，一部份人的反對批評也不足慮。談到魯迅，他責怪蘇雪林所用「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一類字句，未免太動肝火，是舊文字的惡腔調，而謂「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論及獨立評論的文字態度，胡適更直截了當的答覆說：「我們（至少可說我個人）的希望是要鼓勵國人說平實話，聽平實話。這是一種根本的治療法，收效不能速，然而又不甘心做你說的『慷慨激昂、有光有熱』的文字，——也許是不會做，——奈何！奈何」！[86]這封私人的信件，尤見胡適在面對共黨問題時，除了原來容忍嘗試的信仰之外，還要求大家健全自己，樹立本身的好榜樣。

抗戰期間，胡適無論在駐美大使任內或卸任之後，凡作公開談話，極少談到共黨

---

[83] 胡適，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書局，民國二十年三版），卷一，頁七四～七九。書信選，上册，頁四〇八～四一四。

[84] 胡適文存三集，卷一，頁五三～六〇。

[85] 胡適，「追念吳稚暉先生」，自由中國，第十卷第一期（民國四十三年一月一日），頁五～六。胡適在這篇文章中有一段話說：「稚暉先生總憂慮共產黨還要大得意一番，中國免不了殺人放火之刼。我却不這樣想。……這是二十五年前的話。現在看來，我是錯了，他的遠慮是很可以佩服的」。

[86] 「蘇雪林致胡適」（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胡適致蘇雪林」（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書信選，中册，頁三二五～三三五，三三七～三四〇。胡適寫信給蘇雪林的時候，西安事變已經發生。在那段緊張的日子裏，他因為斥責張學良，才順便批評到共黨的「聯合戰線」。見胡適，「張學良的叛變」，大公報（上海），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問題，但是他與國內官員函電來往，也了解一些國共關係的新發展。⑰新四軍事件發生，國共戰時合作的關係破裂，引起美國方面批評，胡適除致電政府要求了解眞象，並曾根據美方反應提出五點意見：一是避免直接衝突，以息外間反感；二是官場營私舞弊惡習應竭力肅清；三是資產階級應使平均負擔戰爭責任；四是中國米珠薪桂，必有極多不滿份子，政府應當設法助之，以免左傾；五是農工情形應有明顯救濟辦法，如此共黨或可失去其號召能力，而不再擴充。⑱這五點意見，顯示胡適堅信共黨問題的處理，要在以政治改革收攬人心。大使卸任之後，胡適雖留居美國，仍與國內友人維持聯繫，對共黨問題表示關切，所以王世杰於民國三十三年六月有信給他說：「目前難題，一爲中蘇關係（華萊士來華或有裨益），二爲國共關係，三爲物價狂漲。……中共問題，刻在談判中，或可得一初步解決。總之，一切危難，都是磨練我們的魄力與耐性的。如果作如是觀亦盡可樂觀的向前做去，不必過分憂念」。除此以外，陶希聖在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也有長信給胡適談中共問題。⑲

胡適對共黨問題日益憂慮，一方面因爲國共衝突日增，一方面也是因爲歐洲各國都有類似的困擾。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八日，他在 William Henry Chamberlain 家吃飯，碰到在經濟學人工作的 Prof. Haberler 和在基督科學箴言報工作的 Mr. Markham，談到南斯拉夫共產黨游擊隊的情形。那天胡適有一段日記寫道：「最近歐洲新解放的各國（法、比、丹、意、希臘），無一國不發生政府與共黨主持的『抗戰隊』（或其他名稱）的火併情形。政府主張解除此種軍隊的武裝，而此種隊伍不受命，故發生流血。最慘者爲昨日的英國海陸空軍開火援助希臘政府，攻擊其他的『抗戰隊』事件」。他又寫道：「此種事件最足以使我們明瞭這十年多的中共問題，及這十年的中共對日作戰的問題的態度，及將來的中共問題」。⑳

抗戰勝利之初，胡適曾希望稍盡自己的力量，對國共衝突作一點化解工作。他請王世杰轉送一封電報給毛澤東，勸毛澤東與中共領袖「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爲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他說：「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十八年糾紛一朝解決，

---

⑰ 「張忠紱致胡適」（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與五月二日），「王世杰致胡適」（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以及十一月），電稿，頁三二，三六～三七，四〇，八五。

⑱ 「胡適致外交部電」（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胡適致陳布雷」（一九四一年三月），電稿，頁九三～九四，九七～九八。

⑲ 「王世杰致胡適、周綆生」（民卅三年六月廿八日），書信選，中册，頁五七〇～五七一。「陶希聖致胡適」（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三十日），書信選，下册，頁一一～一六。

⑳ 胡適的日記，頁六〇五。

而公等廿餘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內戰而完全消滅。試看美國開國之初，節福生十餘年和平奮鬬，其手創之民主黨遂于第四屆選舉取得政權。又看英國工黨五十年前僅得四萬四千票，而和平奮鬬之結果，今年得千二百萬票，成爲絕大多數黨。此兩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黨，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㉑ 胡適叮嚀再三，無非是要中共作和平的政黨，走民主的道路，希望國共衝突能够以民主和平方式解決。

胡適從民國二十六年赴美辦外交，去國將近九年之後，於三十五年七月初坐船回到上海。當時正是美國特使馬歇爾(George Marshall) 在中國調解國共之爭，衝突究竟如何解決，還沒有明白的跡象。在上海碼頭有人問及對國共問題的看法，胡適回答說：「葫蘆裏無藥，無可奉告」。他又表示去國九年期間，最後三年都在哈佛和哥倫比亞講授中國思想史，對國內政治問題，隔膜已久，回國後仍將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不久北大教務長周炳琳有信給胡適，也主張保持超然，其中有一段話說：「報載先生到後，對記者談話，謂將保持自由作風，信仰言論自由，容忍他人之自由。此誠爲適時之表示。目前晤李仲揆先生，他要我們注意防備在黨爭之下內部意見不一致，馴至不能互容，以致不但不能矯正時弊，反爲外力所乘」。㉒ 周炳琳的信是八月寫的。七月十一日李公樸在昆明遇刺身亡。四天以後，聞一多也在昆明遇刺身死，潘光旦、張奚若、費孝通等九教授走避美國領事館。在政治衝突的夾縫裏，果然又發生一次軒然大波，犧牲受難者之中，不少都是胡適的朋友。

不過胡適仍然樂觀，對國內外大局的發展，在回國之後有整整一年的時間，還是從好的方面去看問題。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他在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評議委員會，對記者公開談論時局。談到國際關係，他說戰後美、英、蘇三國外交代表儘管唇槍舌戰，但都不願決裂，新的聯合國組織有美、蘇兩國參加，向來以侵略爲主義的國家如德、意、日等，都沒有置喙餘地，比走第一世界大戰以後國際聯盟的缺少美、蘇參與，情況要好得多。談到國內政治，他也說比過去的情形有進步，共黨在各地的活動不受干涉，言論也比較自由。他說：「自由爲一種習慣，須逐漸養成，容忍亦是一種習慣，須逐漸養成，現在大家說想說的話，都是好事」。㉓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和七月，胡適發表兩篇重要的文章，表現的也還是一種鼓勵

㉑ 「胡適致王世杰」「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王世杰致胡適」（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三十日），書信選，下彙，頁二六～二七。胡信中節福生卽 Thomas Jefferson.

㉒ 大公報（上海），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六日。「周炳琳致胡適」（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一日），書信選，下册，頁一一七～一一八。周信中所提李仲揆，卽地質學者李四光。

㉓ 申報，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容忍、樂見調和的心情。第一篇文章論戰後美、蘇的衝突與「兩個世界」壁壘的形成，當時有許多人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爆發，他告訴大家不要太悲觀。他認爲戰後兩年的世界形勢總括而言，蘇俄和美國「都不願破壞世界的和平」，「都在籌劃本身的安全」，蘇俄是用擴張勢力範圍謀他本身的安全，美國是用「堅忍與耐心」的政策來謀本身的安全，兩者的對峙使「兩個世界」因而明朗化，而明朗化正是避免誤解和衝突的有效方法。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都是由於國際關係的不明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沒有弄清楚英國會不會爲比利時的中立被破壞而戰，也沒有想到潛水艇的戰略會造成美國對德國絕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勒進攻波蘭之前，他沒有弄清楚英、法兩國會爲波蘭而戰，也沒有弄明白受中立法約束的美國最後也會參戰。新的情況不同。美、蘇兩國的立場明白清楚，不容置疑，他們政策的明朗化，可以免除彼此的誤解，這「正是全世界和平的新起點」。除此以外，胡適還是相信聯合國有助於和平。他主要的證據，就是美、蘇兩大勢力以及有關國家的代表，無論是在聯合國安理會內，或在聯合國大會之外，或在外長會議裏，儘管爭論得激烈尖銳，爭論完了，都還是聯合國的會員國，沒有一國肯放棄退出這個新興的國際組織。他最後作結論說：「有了明朗化的國際局勢，再加上長期集會的國際新機構與國際新生活的訓練，使旨趣不同的國家都有個儘量公開辯難爭論的機會，使政體與經濟組織不同的各國代表都有個從辯難爭論裏相互認識了解的機會，那末，十年或十五年的國際對峙形勢也可以逐漸進步，演變成一個更調協、更合作的新世界了」。[94]這篇文章是五月發表的，重點在國際局勢。

胡適七月發表的文章，論「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主要着眼點在國內要結束訓政，實行憲政。他把世界各國政黨分爲甲式政黨和乙式政黨。甲式政黨特色有四點：一是黨員沒有確定的人數，沒有黨籍可考；二是黨員投票都採無記名，黨員的言論都很自由，不會受到任何干涉監視；三是容許其他政黨的競爭，並且尊重少數黨的權利；四是選舉失敗時願意和平的轉移政權給勝利的黨。乙式的政黨也有四點特色：一是組織嚴密，黨員人數、黨籍隸屬都精密可查；二是黨的紀律嚴格，黨員沒有自由，沒有秘密；三是黨的目的在一黨專政，在未取得政權時，不恤以任何手

[94] 胡適，「眼前『兩個世界』的明朗化」，胡適的時論一集（南京六藝書局，民國三十七年），頁七～一〇。胡適的時論一集內主要的文章後來又收入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這篇文章沒有收入，大概就是因爲調和的語氣太濃，不能配合「必須選擇」的新論調。

段取得政權；四是絕對不容許反對黨的存在，以鞏固一黨永久專政的權力。以各國政黨而論，英、美、西歐式的政黨叫做甲式政黨，蘇俄、意、德諸國後起的政黨，都屬於乙式政黨。比較各國甲乙二式政黨之後，胡適回頭談到中國的政黨。他說，中國國民黨的創立者孫中山先生在革命事業最困難的時候，感覺需要一個「有組織、有力量的革命黨」，所以他改組國民黨，從甲式政黨改爲乙式政黨。但是中山先生畢竟是愛自由講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中，一黨專政不是最後的境界，只是過渡到憲政的暫時訓政階段。他的最後理想，還是那甲式的憲政政治。談到結束訓政、實行憲政，胡適更以非常樂觀的語氣說：「近年國民黨準備結束訓政，推行憲政。這個轉變可以說是應付現實局勢的需要，也可以說是孫中山先生的政治綱領的必然趨勢。一個握有政權的政黨自動的讓出一部份政權，請別的政黨來參加，這是近世政治史上稀有的事。所以無論黨內或黨外的人，似乎都應該仔細想想這種轉變的意義。依我個人的看法，這個轉變應該是從乙式的政黨政治變到甲式的政黨政治，這裏面似乎應該包括黨的內容與作風的根本改革，而不僅僅是幾個政黨分配各種選舉名額或分配中央與地方的官職地位。如果訓政的結束能够引起一個愛自由的提倡獨立思想的，容忍異己的政治新作風，那才可算是中國政治大革新的開始了。」[95] 胡適這篇談政黨的文章，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採用「甲式」和「乙式」的劃分，完全捨棄「民主」與「極權」的劃分，用意所在，當是避免以「極權」的惡名，刺激當時中國的兩大政黨。其次是他顯然反對戰後各黨各派政治協商，整天互爭地盤名額，而希望所有中國政黨藉實行憲政的機會，共同走民主的大道。

八、

民國三十六年春夏之交，無論國際情勢的發展，或者國內政局的演變，都有急轉直下的趨勢。在國際情勢方面，美國總統杜魯門 (Harry S. Truman) 已於三月十二日要求撥款，援助希臘和土耳其，防止共黨在兩國的滲透顛覆。德國問題也形成了僵局，西方國家要求德國各佔領區先做到經濟的合併統一，但爲蘇俄拒絕，蘇俄反過來要求一百億美元的賠償，並且分享魯爾區 (The Ruhr) 的控制權，也被西方國家拒絕，莫斯科外長會議因此於四月二十四日宣告失敗。六月五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發表演講，提出大規模經濟援歐計畫，這項計畫對象原擬包括所有歐洲國家，但是蘇俄領導所有東歐共黨國家拒絕受援。這一連串發

[95] 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頁一～四。

展，就是胡適所謂「兩個世界」的形成，也是後來歷史學者所謂「冷戰的開始」，實為戰後國際關係最暗淡的時期。國內的情形，急劇惡化的現象也很明顯。黃金美鈔飛漲，外匯存底空虛，物價管制政策失敗，顯示財政經濟發生嚴重困難，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因而在各方責難批評聲中下台。學潮因為李公樸案、聞一多案以及美軍強姦北大女生沈崇案，早在上年已經陸續發生，到了民國三十六年五、六月間，因為物價飛漲，維生困難，再加共黨從中煽動，全國學生更是展開「反饑餓」的全面罷課示威。同時政治軍事的發展，也是陰霾四合，出現大風暴即將來臨的徵兆。馬歇爾調解的工作於一月初宣佈結束，他本人回美擔任國務卿，國共的談判因此更加困難。協商之門漸閉，軍事鬪爭轉烈，儘管雙方各有斬獲，但是山東孟良崮的陷落，東北四平街的激戰，對國軍士氣造成重大打擊。到了六月底，政府完全放棄談判，並且下令通緝毛澤東。七月四日，政府更宣佈全國總動員，要戡平共黨叛亂。[96]總而言之，國際情勢也好，國內政局也好，都顯示調和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對立衝突正在急劇升高。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胡適五月的文章強調「兩個世界」壁壘的形成有助於增加彼此認識，減少彼此誤會，是「世界和平的新起點」，七月的文章要求黨內黨外改變政黨的內容和作風，共同走甲式政黨政治的民主道路，實際上已是期望調和的最後呼喚。八月一日他再發表廣播演講，談「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就明顯的放棄了調和的立場，回到他在戰時曾經提過的民主對抗極權的主張，而且他箭頭所指，就不再是德、意、日的獨裁，只是蘇俄和共黨的極權。

在這篇廣播演講之中，胡適首先說明世界文化的共同趨向有三，一是用科學的成績解除人類的痛苦，增進人生的幸福；二是用社會化的經濟制度來提高人類的生活；三是用民主的政治制度來解放人類思想，發展人類的才能，造成自由的獨立的人格。談到民主政治制度的發展，他說有人會說民主政治已經不時髦了，時髦的政治制度是一個代表勞農階級的少數黨專政，剷除一切反對黨，用強力來統治大多數的人民，個人自由是資本主義的遺產，是用不著的，階級應該有自由，個人應該犧牲自由，以謀階級的自由。他說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體專制的潮流，……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波折，一個小小的逆流」，民主自由的趨向，才是「三四百年來的一個最大目標，一個明白方向」，「我們可以不必因為

[96] 關於美蘇冷戰之形成及其解釋，見張忠棟，「冷戰起源的各種解釋」，美國研究，第六卷第二期（民國六十五年六月），頁七三～九六。關於同時期國內政局的變化，參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〇年），頁七七一～七八二。

中間起了這一個三十年的逆流，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胡適並且進一步以蘇俄爲例，說明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如何破壞了他們原來要爲勞農大眾爭利益的目標，又以印度獨立和中國結束一黨訓政作證據，證明許多國家「都還是朝著爭民主、爭自由的方向走」。他最後作結論說：「有些人看見現在世界上兩個大集團的對立，『兩個世界』的明朗化，就以爲第三次世界大戰禍，不久卽將來臨了，將來勝敗不知如何，我們不要押錯寶，以致後悔無及！這是很可憐的敗北主義。所謂『兩個世界』的對壘，其實不過是那個反自由不容忍的專制集團，自己害怕自己氣餒的表現。這個集團至今不敢和世界別的國家自由交通，這就是害怕的鐵證！這就是氣餒。我們認淸了世界文化的方向，儘可以不必擔憂，儘可以放大膽子，放開腳步，努力建立我們自己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我們要解放自己，我們要造成自由獨立的國民人格，只有民主的政治，可以滿足我們的要求」。⑰

「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發表之後，引起了幾位聽眾的抗議。有一位聽眾寫信給胡適說：「歷史的潮流並不是固定在走那個方向，若說歷史只有一個潮流，而且這個潮流一定獲勝，那就未免太過於簡單，過於樂觀了」。又有人說：「世界分成兩個壁壘，倒未嘗不是可以樂觀的。假如世界成了淸一色的文化，無論怎麼說也是不好的。若說這一個是大潮流，那一個是小波折，那是看得過於單純，也有點偏袒了」。陳之藩當時是天津北洋大學三年級的學生，他聽了廣播以後也寫了一封信給胡適，表示像「民主自由是大潮流，赤潮是一個小迴波，……這類詞句，不該出於胡先生之口。因爲這類潮流啦，迴波啦，只是一些政治的口號，而且你說你是正流，他說他是正流，共產黨專愛罵人反動，只表示他們的粗暴與蠻橫，並不能闡明任何理由」。⑱由於這許多反應，胡適便再作廣播，以更堅決的語氣，談「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胡適在「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中斷釘截鐵的答覆聽眾的質問說：「我並不否認『偏袒』那個自由民主的潮流，這是我的基本立場，我從來不諱飾，更不否認，……」。他說他之所以偏袒民主自由的潮流，是因爲第一，他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與言論出版的自由是社會改革與文化進步的基本條件；第二，他深信幾百年中逐漸發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最有包含性，可以推行到社會的一切階層，最可以代表全

---

⑰ 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頁五～一二。

⑱ 同上，頁一三～一七。陳之藩，在春風裏，頁五一～五七。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三日胡適致函陳之藩，其中有一句話說：「我那篇『我們必選擇我們應走的走的方向』，是答你的信」。見書信選，下册，頁三四五～三四六。

民的利益；第三，他深信幾百年（特別是最近一百年）演變出來的民主政治，雖然還不能說是完美無缺，確已養成一種愛自由、容忍異己的文明社會。說明了他偏袒民主自由的理由之後，胡適又說明「那個反自由、反民主、不容忍的專制集團」的缺點和缺乏自信。他提出這方面的三點證據說：第一，那個專制集團還不敢相信他們的人民，還得用冷酷的暴力壓制大多數的人民；第二，那個專制集團還不敢和世界上別的國家自由交通，既不容許外國人到他們那裏自由觀察遊歷，也不容許他們自己的人民自由出國或和外國人來往；第三，那個集團有全世界最廣大的疆土和最豐富的原料鑛藏，但是他們還要向四周擴充「屛藩」，樹立「衞星」，同時他們還不放棄世界革命的政策，還迷信只有在世界的紛亂中才可以得著自己的安全保障。如此批評猶嫌不足，胡適還要進一步解釋「這個反自由不容忍的專制運動」何以是「這三十年歷史上的一個小小的逆流，一個小小的反動」。他說：「……他在這十年之中，越走越倒回去，馬克斯不够用了，列寧也不够取法了，於是彼得大帝被抬出作民族英雄了，甚至於『可怕的伊凡』也被御用的史家與電影作家歌頌作民族英雄了！這不是開倒車嗎？這不是反動的逆流嗎？這個專制集團在他三十年前革命理想最高潮的時期，也曾宣告放棄帝俄時代用暴力取得的一切外國權益。現在呢？他在中國東北的行爲，他在大連旅順的行爲，處處是回到帝俄時代的侵略政策，這是崇拜彼得，崇拜伊凡的反動心理的當然結果。所以我們說這是一個小小的逆流，應該是不錯的。開歷史的倒車，所以說是逆流。不自信，害怕而氣餒，所以說是小的反動」。說到這裏，胡適話鋒一轉，便以最堅定的語氣結尾說：「我們中國人在今日必須認淸世界文化的大趨勢，我們必須選定我們自己應該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們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團結全民的力量來解決全民族的困難，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給我們培養成一個有人味的文明社會」。[99]

這篇演講廣播之後，並在全國四十多家報紙發表，是當時中國人面對尖銳對立衝突必須有所選擇的艱難時刻，一篇深具南針意味的代表性文獻。陳之藩聽了廣播之後，曾到北平去看胡適，表示「此時不能再沉默，應該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大約半年之後，局勢更變壞了，共黨的勢力更大了，胡適寫信給陳之藩，其中有兩段很可玩味的話。一段話說：「思想切不可變成宗教。變成了宗教，就不會虛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我寧可保持我無力的思想，決不肯換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也許有人說，這是同『葡萄是酸的，我本來不想吃』一樣」。另外一段話說：

---

[99] 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頁一三～一七。

「別說緩不濟事，緩不應急。這是『任重而道遠』的事，不可小看了自己」。胡適和陳之藩，從此做了忘年的好朋友，以後時有書信往還。十幾年以後，陳之藩寫悼念胡適的文章，提到「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仍說它是「中國幾十年來不得了的一篇文獻」，並說胡適「那種斬釘截鐵的聲音，至今仍作金石響」。⑩⓪

胡適的幾位老朋友出於外交的考慮，這時倒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錢端升是最早隨胡適去美辦理戰時外交的學者，戰後也在北大政治系任教。民國三十六年春天美蘇對峙形勢出現時，他便警告中國不可偏於一方，尤其不可結此攻彼。他說假定美蘇的對峙不走向戰爭，中國的偏袒就毫無意義，只是徒然減少中蘇友好的可能。假定美蘇走向鬥爭，中國更應保持中立的立場，因爲：第一，那樣將有助於中國疏解兩方，使鬥爭變爲合作，維持世界和平；第二，美俄各有是非，各有曲直，中國沒有理由因爲黨此伐彼而捲入他們的是非曲直，並捲入他們的戰爭；第三，如袒美反蘇，則美蘇戰爭一旦發生，中國將首先受到蘇俄攻擊，慘遭犧牲。錢端升在文章中也談到中蘇關係，譬如新疆民族問題，雅爾達密約與中蘇友好條約，以及蘇俄在東北拆運戰利品。他說根據種種分析，「我們實在看不出蘇聯有威脅我們安全獨立的企圖，甚至連重要的可能衝突，也是找不出來。所謂衝突也者，三之二是我們自己內部的紛亂及無能，六之一則已經有了條約的協議，只餘六之一方是懸案」。同時他認爲像拆運戰利品這樣的懸案，雖對我國東北復興造成重大打擊，但「並不能構成反蘇的理由，更不是一個非訴諸戰爭不可的事件」。⑩①

國立武漢大學校長周鯁生也在戰時幫胡適辦過外交。他在民國三十七年初有一篇文章，批評英美扶植德日抵制蘇俄。他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國家的錯誤就是扶植德國抑制蘇俄，結果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國家還是這樣做，幫助戰時的敵國，對抗戰時的盟邦，這完全是歷史的重演，是開歷史的倒車。他主張和平，主張協商，反對把蘇俄看成侵略國家。他說：「現今聯合國的列強間情感衝突，利益爭執的處所很多，尤其美國與蘇聯形成對立之局，誠不可諱言。可是外交協商之途徑並未閉塞；聯合國組織仍然是大家共同尊重而應用之和平機構。國際上現在並沒有真正不能解決的爭端，也還沒有絕對勢不兩立的集團。我

---

⑩⓪ 同註⑨⑧。胡適晚年對胡頌平回憶認識陳之藩的經過說：「三十六年我在北大當校長時，曾要他到北平來看我一次，那時就認識的。在那個時候，一般青年都是思想左傾，而他已是反共的青年，他從俄國的小說裏把他的思想造成反共。……一個青年學生能從小說裏養成反共的思想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我是在那個時候認識他的」。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三年），頁二〇。

⑩① 錢端升，「世界大勢與中國地位」，觀察，第二卷第三期（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五日），頁三～六。

們並相信在聯合國列強中間尚沒有眞正像戰前德意志日本那樣好戰的侵略勢力。因此我們不認爲現在就有根本變更政策的理由」。談到中國應有的政策，他以最簡單的兩、三句話說：「我們中國向來有所謂以夷制夷，以毒攻毒之策。在近代外交上那套舊把戲曾經試過而不見效，有時反招致危險的結果，受人譏評」。⑩②

這些認爲蘇聯不足構成侵略，主張中國不必反蘇的意見，胡適已經斷然不能接受。所以他在看到周鯁生的文章之後，立即寫了一封信公開發表，而且一上來就說：「前幾天我讀了老兄『歷史會重演嗎？』那篇文章，我頗驚訝我們兩個老朋友對國際局勢的觀察竟相隔如此之遠」！說到正題，胡適首先不能同意所謂西方國家武裝德日的說法。他說他觀察西方民主國家的負責言論和行動，在這方面可作三點判斷：第一、西方民主國家並沒有放棄「防止德日侵略勢力」復活的根本政策；第二，西方根本不許德日武裝，所以不能進一步說他們要扶植德日來抵制蘇俄；第三，西方扶植德日，只是幫助兩國民族解決他們戰後的生活問題。然後胡適談到蘇聯，談到他對蘇聯看法的轉變。他說他是一個深信和平主義的人，向來對蘇聯懷著很大的熱望，並且夢想過中蘇兩國邊界能倣照美國和加拿大的邊界，不用一個士兵防守！但是，他說：「雅爾達秘密協定的消息，中蘇條約的逼訂，整個東三省的被拆洗——，這許多事件逼人而來。鐵幕籠罩了外蒙古、北朝鮮、旅順、大連。我們且不談中歐與巴爾幹。單看我們這兩三年之中從蘇聯手裏吃的虧、受的侵害，——老兄，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一大堆冷酷的事實，不能不拋棄我二十多年對『新俄』的夢想，不能不說蘇俄已變成了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他在這封信中甚至指出，蘇聯「這個侵略勢力可能比德日還更可怕，因爲他們本錢比德日更雄厚，他的野心比德日還更偉大，他的勢力比德日極盛時還更普遍。有這種憂慮的人，世界各地都有，在中國特別多，因爲蘇聯近年對中國的行爲實在不能不叫人害怕而憂慮」。⑩③這樣的一封信，而且用公開的方式發表，「成爲一篇轟動全國的大文章」，⑩④更顯示胡適已經完全放棄妥協調和，對蘇俄極權侵略表明勢不兩立的立場。

---

⑩② 周鯁生，「歷史會重演嗎？」，轉載於中央周刊，第十卷第九期（民國三十七年二日十九日），頁一二～一三。

⑩③ 「胡適致周鯁生」（民國三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書信選，下册，頁三一〇～三一四。這封信後來以「國際形勢裏的兩個問題」爲題，收入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頁一九～二三。

⑩④ 「周鯁生致胡適」（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六日），書信選，下册，頁三一六～三一八。周在這封信中說明他寫「歷史會重演嗎？」的八點理由，其中包括他深信德、日是最好戰的民族，蘇俄不像德、日好戰，其對外發展侵略主要靠政治方法，而不靠戰爭，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對立衝突，不是再一次世界大戰所能解決。同時胡適還收到很多信，有的熱烈響應贊成他的意見，也有以「胡適的胡說」爲題，罵他是「買辦文人，投機政客」。見書信選，下册，頁三一五～三一六，三三八～三三九，三四四～三四五，三四八～三五一，三五二～三五五。

胡適拉開了反蘇聯反共產的大旗，要求大家選擇民主自由的大方向。大約十年以後，胡適說他表明反對共黨極權，誇說民主自由將來一定勝利的時候，他「竟不知道那正是蘇聯獨霸世界的一年，正是西方國家毫無武裝力量可以抵抗蘇俄集團的時期，那正是毛澤東(Dec. 1947) 自誇紅軍打垮了蔣的攻勢，從此紅軍佔取攻勢的一年」⑮！民國三十七年一年的變化的確很大，不說蘇俄完全控制了東歐，中共勢力的擴張，也是出人意外的迅速。到了這一年底，濟南，遼瀋已經失守，徐蚌岌岌可危，平津也被包圍。胡適在北平圍城之中，主持了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的紀念，蔣總統派專機去把他接出來。第二年四月，政府再派他去美，希望他再做一點外交上的挽救工作。⑯

變亂當前，民主自由的希望之火，即將在中國大陸迅速熄滅，胡適親歷其境，不免黯然神傷。三十七年陽曆除夕，他和傅斯年在南京度歲，相對淒然。兩人一邊喝酒，同誦陶淵明「擬古」詩第九首：「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誦罷兩人都流下了眼淚。⑰胡適第二年到美國，五月二十二日有信給趙元任說：「別後，我的心情很不好，沒有一件事值得報告你們。到 Washington 去了兩次，都不曾住過一天半。許多同情於中國的朋友，如 Hornbeck, 如 Bullitt, 如 Prof. George H. Blakeslee，都覺得『一籌莫展』；第二次去時，見着 Wedemeyer, 他也是『有心無力』。我後天（廿四）又得去美京一次，可以見着 Paul Hoffman 與 Butterworthe諸人」。到了七月十五日，他通知駐美大使館，取消一切約會，不接見任何政府或國會的領袖。他後來追憶那段時期的心情說：「我感到抬不起頭，說不出話。……因爲大家成見太深，使我處處碰壁；也因爲局勢太大，不是私人間談話所能轉移的。在這個時候，只有替國家保留一些尊嚴，替國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約會」。⑱

---

⑮ 陳之藩，在春風裏，頁五三。

⑯ 胡適離平的經過，見陳雪屏，「用幾件具體的事例追懷適之先生」，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五期（民國六十五年五月），頁八～一二。關於奉派之說，最初見於胡適在自由中國雜誌三週年紀念會演講。後來陶希聖也提到這件事，並引用胡適對他說的一段話：「我應該去溪口，拜望蔣先生。我想了一下，還是不去的好。我就是這樣一直往美國去，能不能替國家出一點力？總是盡心去看着做。請你把這個意思轉達蔣先生。我就是這樣去了」。見陶希聖，「關於敦請胡適先生出任行政院長及其他」，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五期，頁一八～二一。抵美之後，政府改組，閻錫山爲行政院長，發表胡適爲外交部長，胡適力辭不就。見年譜，第六册，頁二〇九五～二一〇〇引朱家驊先生所遺檔案電文抄件。

⑰ 年譜，第六册，頁二〇六五～二〇六六。

⑱ 周法高編，近代學人手跡：胡適給趙元任的信（臺北考政出版社，民國六十年），頁一六～一七。胡適，「北大同學會歡迎會上講詞」，見自由中國社論，胡適言論集，乙編（臺北華國出版社，民國四十二年），頁六〇～六二。給趙元任信中所提美國人名，多是美國政府舊人，爲胡適戰時在美辦外交時認識的老朋友，都曾努力幫助美國援華。Wedemeyer 卽魏德邁，曾於戰後以特使身份來美考察國共衝突。

但是一切的挫折，總不能動搖胡適的基本信念。從民國三十七年到三十八年，他總不忘公開主張民主自由，反對共產極權。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民主憲政開始實施，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南京合開，胡適前往出席，並參加了總統和副總統的選舉。當時蔣主席曾要王世杰出面，請他競選總統，他思慮再三，最後勉強表示可以做一個「無為的總統」。但是國民黨內部開會，多數人都反對找黨外的人競選，他得知這項決定，很有如釋重負的感覺。[109]

同年八月，胡適發表一篇文章談自由主義。他在文章開始的第二段就說：「自由主義最淺顯的意思是強調的尊重自由。現在有些人否認自由價值，同時又稱是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裏沒有自由，那就好像『長坂坡』裏沒有趙子龍，『空城計』裏沒有諸葛亮，總有點叫不順口罷。據我的笨見，自由主義就是人類歷史上那個提倡自由、崇拜自由、爭取自由，充實並推廣自由的大運動。……在這個大運動裏，凡是愛自由的，凡是承認自由是個人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基本條件的，凡是承認自由是難得而易失而必須隨時隨地勤謹護視培養的，都是自由主義者」。接著他舉出一些中國人作例說，從墨翟楊朱到桓譚王充，從范縝傅奕韓愈到李贄顏元李塨，都是為信仰思想自由奮鬥的東方豪傑之士，很可以同他們的西方同志齊名比美。

但是他認為許多中國人雖然追求信仰思想自由，卻沒有像西方一樣抓住政治自由的重要性。他說西方自由主義者強調的擁護民主，堅持一個國家的統治權必須操在多數人民的手裏，這是西方自由主義的絕大貢獻，他們覺悟到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夠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更進一步，他又說近代西方自由主義還有「最可愛慕又最基本的一個方面」，那就是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自由權利。這裏他特別引用哥倫比亞大學歷史教授納文斯 (Allen Nevins) 的一句話：「眞正自由主義者，——連正統的社會主義者都包括在內，——雖然意見互有不同，但具最後歸趨都一致認為多數人的統治以尊重少數人的基本權利為原則。」然後他以英國政策為例，指出英國工黨從五十年前的小黨到大戰勝利之後得到絕對多數的選票，使英國資本主義政策變到社會主義政策。「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力革命」，只靠無記名投票，尤見多數統治與尊重少數的民主政治，可以做到政治權力的和平轉移。他說，所以在許多人心目中，「自由主義」就是「和平改革主義」的別名，但是有些人反對自由主義，又正因為它是「不革命主義」。就他個人來說，他完全承認現代的自由主義

[109] 王世杰，「胡先生的政治人格與政治見解」，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五期，頁一三～一四。

應該有「和平改革」的含義，不覺有暴力革命的必要。⑩前文提到，胡適曾於抗戰勝利之初致電毛澤東，以英國工黨的例子，勸毛放下武器，作和平的民主奮鬥。事隔三年，面對漫天的烽火以及暴力革命的如火如荼，他仍然相信英國工黨的例子可以通行各國，他還是要談「自由主義」，要談「和平改革主義」。

胡適三十八年去美，船行在太平洋上，又做了兩篇文章，一是「『自由中國』的宗旨」，一是「『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序言」，尤見他對民主自由的篤信不移，並不因山河變色而稍有猶豫。「『自由中國』的宗旨」有四點：第一是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眞實價值，並且督促政府(各級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與民主的社會；第二是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鐵幕之下剝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不讓他擴張他的勢力範圍；第三是盡力援助淪陷區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最後是要使中華民國成爲自由的中國。這個「宗旨」的由來，是包括胡適在內的一些人，面對當時共黨排山倒海的勢力，要想辦一份報紙或刊物，作爲「自由中國運動」的起點，以圖挽救中國，所以在四條宗旨之前還有一段話，充滿了孤臣孽子的口氣。這一段話說：「我們在今天，眼看見共產黨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層十分嚴密的鐵幕。在那鐵幕底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無法存在。這是古代專制帝王不敢行的最澈底的愚民政治，這正是國際共產主義有計劃的鐵幕恐怖。我們實在不能坐視這種可怕的鐵幕普遍到全中國」。⑪

「宗旨」寫好之後，胡適把它寄給王世杰、雷震和杭立武，表示這篇「宗旨」寫了幾次都寫不成，最後寫成這篇短的，十分不滿意，要他們請崔書琴、張佛泉、毛子水等人仔細斟酌，最好是完全重寫過，同時提醒他們說：「請不要忘了，傅孟眞是作文章的大好手」！信中又說：「萬不得已時，還是不發表書面的宗旨或約章，若發表宗旨定稿，請不要具名」。這封信是四月十六日寫的。半年多以後，自由中國創刊，便把四條「宗旨」完全沒有修改的刊登在封面的內頁，以後每期都照樣刊登，爲該刊努力追求的目標。但是胡適逐漸覺得四條宗旨不夠用了。他說他在寫那四條的時候，「中國還保存著三分之二的河山，所以我那四條裏就沒有提國家

⑩　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頁二五～二八。

⑪　同上，頁二九。後來胡適一直主張以民主自由反共。但有人主張以中國傳統反共，並批評說共產主義就是提倡學術自由的人破壞中國傳統之後引進來的，胡適很感慨的說：「自己的國家弄不好，要把幾千年的老東西搬出來。他們既然這樣的尊崇孔孟學說，爲甚麼又信天主耶穌呢」？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頁六七。

的獨立。試舉此一例，可見那四條已不够用了」。因此，他「千萬請臺北各位朋友，實行組織一個『自由中國』的組織，細細討論一套切合今日需要的宗旨」。他說：「雪艇、孟眞、子水、佛泉諸人一定有更好、更切要的意見」。⑫

「『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序言」，也是同時寫好，同時寄給在臺北的朋友。陳獨秀於民國二十一年被捕，二十六年出獄，抗戰時移居四川江津，和共產黨完全斷絕往來，對於民主政治有很多新的見解，陸續寫信告訴他的朋友西流和連根等人，同時還寫了幾篇文章。這些信和文章在他民國三十一年去世之後，由他的朋友編印成册，胡適看到的時候已經很晚。胡適讀完這些信和文章，在太平洋的船上想到老朋友思想的轉變，想到國家的變局，內心的感觸必然極深。他在「序言」中說陳獨秀的最大轉變，就是指出共產黨一方面說要建立「無產階級民主」（或者說走向「大眾的民主」），一方面要打倒資產階級的民主。他引述陳獨秀的話說，民主政治的眞實內容是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徵稅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之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以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這些本來就是大眾需要的東西，你不能把這些東西不要，把「資產階級民主」推翻，然後另外搞一套東西，說是「無產階級民主」，說是「大眾的民主」。他特別強調陳獨秀在一年（民國二十九年）之中，曾四次列舉「民主政治的眞實內容」，最後一次在「我的根本意見」一文中，除了指明民主政治中一切公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的自由之外，更申說一句：「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胡適說：「在這十三個字的短短一句話裏，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的生死關頭。近代民主政治與獨裁政制的基本區別就在這裏。承認反對黨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制度就是不容許反對黨派的自由」。⑬

胡適到了美國，大陸很快的全部丢失，共黨將開始對他大張撻伐，他也要更嚴厲的批評共黨，同時盡力支持以民主自由反共的運動，以致後來中共負責宣傳工作的周揚，要說「他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最早的、最堅決的、不可調和的敵人」。⑭這些都是後話，有待異日的研究和探討。

---

⑫ 「胡適致王雪艇、雷儆寰、杭立武」（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以及「胡適致雷儆寰」（民國三十九年一月九日）。此兩信影本由友人提供。
⑬ 陳獨秀，陳獨秀的最後見解（臺北自由中國社，民國三十八年），頁一～一一。
⑭ 胡適，胡適手稿，第九集卷三（臺北胡適紀念館，民國五十九年），頁四九三。

九、

前文探討了胡適堅持民主的經過，時間以民國二十年到民國三十八年爲範圍。從獨立評論民主與獨裁的辯論，從他在中日衝突中看民主與極權的分野，以及從他在共產勢力擴張中堅持民主自由，都可看到他在環境越艱難的時候，他越是要大聲疾呼。動亂當前，獨裁和極權的浪潮滾滾而來，他沒有被淹沒，還時時發作金石之響，更顯現了他的精神和風格。